



中评周刊 | 第 72 期目录

专题 | 电影《窃听风暴》与现实中的「斯塔西」

1. 蒂莫西·加顿艾什：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P. 2
2. 龙应台：你是有选择的——评《窃听风暴》 P. 14
3. 贺卫方：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P. 20
4. 金雁：“追问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 P. 24

观点文章

1. 王克勤：从疫苗事件看中国疫苗安全问题及疫苗管理制度 P. 32
2. 张曙光 张弛：经济增长稳中趋缓 贸易战端影响显现
——2018 年第 2 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P. 50

随笔散记

1. 陈如珍：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民工对家与归属的追寻 P. 66
2. 郭世佑：观念的脚步 P. 70

读书

- 纳博科夫：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P. 72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8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80

蒂莫西·加顿艾什：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蒂莫西·加顿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 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伯林教授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级研究员。本文首发于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4, Number 9 • May 31, 2007，翻译：maxsnoopy，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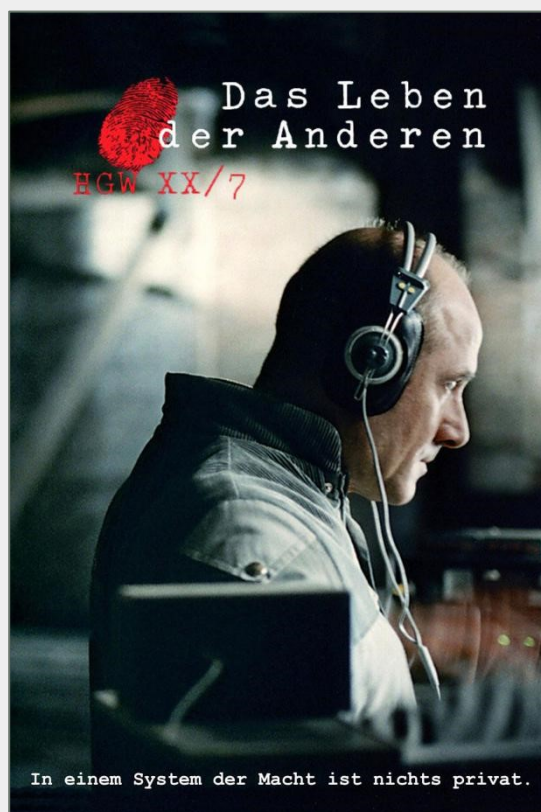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蒂莫西·加顿艾什**教授

德国最独特的成就，在于它把自己与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里最糟糕的两个政治体系中最黑暗的罪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纳粹”、“党卫军”和“奥斯维辛”这些单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法西斯主义非人性的代名词。现在，“斯塔西”这个词正在成为共产主义秘密警察恐怖的世界性的代名词。由 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执导的电影《他者的生活》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将会加固这一联系；这部电影名至实归地获得了奥斯卡奖，而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凭借着第一个链环以我们的想象来预演这第二个链环。纳粹，斯塔西：德国那溃烂的半韵（纳粹与斯塔西的英文为 Nazi 和 Stasi，故有半韵一说。译注）。

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我住在柏林时，我为这样一个难题而迷惑不解：纳粹的邪恶是如何吞噬了这有着辉煌文化的土地？我尝试着去理解，为什么魏玛柏林的人民在阿道夫·希特勒登场之后会有如此的行为？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最让我困扰不已：在国家组织的罪行面前，是

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血统，可以让一个人成为抵抗战士而另一个人成为合作者，让一个人成为克劳什·冯·史陶芬伯格，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试图暗杀希特勒，而让另一个人成为阿尔伯特·斯佩尔？



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 海报

又名《他者的生活》/《别人的生活》，

本片夺得 2007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和当年德国罗拉电影奖的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

很快我就发现，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居住在东德的人们正在另一个德国独裁之下面对着类似的难题，尽管这新的独裁并没有带来那么多真正的杀戮。我可以在历史的进行时来研究这一人类的谜题，而不仅仅只是翻阅尘封的档案。所以我便搬到东柏林居住；后来，我开始写的书与希特勒无关，而是有关共产主义领袖埃里克·昂纳克统治下的德国。当我在另一个德国旅行时，我一次又一次的见证着对斯塔西的恐惧。当我刚拜访完一名在歌德的《浮士德》一剧中扮演主角的演员，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一位朋友在我耳边低语，“小心，浮士德是为斯塔西工作的”。当我对共产主义东德极不客气的评论出现在西德后，一名英国外交官被召唤到东德外交部受到了一份官方抗议（一个政治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评价），从此之后我被禁止再次踏入这个国家。

但是，在当时的西方，这种把东德比作另一个邪恶的德国独裁政权的看法并不被广泛接受。在西方的很多地方，甚至对纳粹-斯塔西的比较也会被看作过时而反动的冷战癥症，会危害到国际关系的缓和。1977 年，《卫报》（Guardian）的记者 Jonathan Steele 认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欧国家

独裁福利政体的典范”。即使是那些自封的“现实主义”保守派在谈论到共产主义东德时，也会采用与他们今天大不相同的语调。在那个年代，“斯塔西”这个词几乎不会被他们所提及。

两件事情结束了这种长期的近视。在 1989 年，东德人民终于自己站了出来，公开谴责斯塔西是他们之前所受压抑的集中体现。但同时，他们也一直压抑着——近乎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关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合作，关于他们每个人对维护共产主义政体所应负责任的回忆。在 1990 年之后，不同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联邦德国全面接管了前东德，其间安全部门的转化并没有任何连续性，在曝光前秘密警察体系的罪恶时也没有任何犹豫。的确是一点也没有。



斯塔西 [Stasi] 标志

前东德“国安”机构，人类史上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由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和线人组成，

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前东德 1611 万人口，其中就有 9 万 1 千名秘密警察和 17 万 5 千名隐藏在民众中的线人，

斯塔西鼓励和迫使夫妻间、父母子女间、师生间以及邻里间充当告密者，

20 世纪 80 年代，平均每天就有 8 位东德公民遭斯塔西秘密逮捕，无数异议人士就此下落不明，

该组织对人民的监控和迫害远超前苏联的“克格勃”，

斯塔西随着东德极权政府的垮台而被解散，

前东德国安部部长米尔克、末代部长沃尔夫冈等高官接受审判并成为罪犯锒铛入狱

在这片养育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 ~ 1886. 德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西方近代史学奠基者之一。译注）的土地上，一种显而易见的新教激情推动着人们去面对过去的罪过；一些东德的不同政见者强烈要求公开前政权的罪行，而许多西德人（尤其是在 1968 年吸取了教训的人们）也不想重复 1949 年之后掩盖并遗忘纳粹罪恶的错误；于是我们看到，超过 110 英里长的斯塔西档案被史无前例的迅速、深入而系统地解密。四十年来，德国开始了第二次自己的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德语，指努力面对过去的过程，译注），开始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当然，东德的老大哥，俄罗斯的克格勃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事情。

尽管刚开始有些犹豫，我还是决定回去看看我是否也有一份斯塔西档案。我的确有。它对我的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有着详尽的记录；当我读着这份档案时，它就像带毒的甜点一样，让我感到深深地不安。借助着德国人建立的历史启蒙运动的工具，我得以对制造这一文件的政治压迫工具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然后，我象一个侦探一样，找到了当年曾告发过我的旧相识，以及我的案件所牵涉到的斯塔西官员。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同意和我谈话。他们给我讲述了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最后会做出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让人可以理解，实在是太让人可以理解；人性，实在是太人性。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档案》。

正因为如此，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观看《他者的生活》的；这部已经广受赞誉的有关斯塔西的电影是由一名西德导演执导的；当柏林墙倒塌时，他还只有十六岁。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奥威尔式的 1984 年，一名热诚的斯塔西上尉 Gerd Wiesler 正在进行一项全方位的监视行动；行动的目标是一位在现政权中享有良好声望的剧作家 Georg Dreyman，以及他美丽而容易激动的女友，演员 Christa-Maria Sieland。随着行动的进行，我们看到这位斯塔西上尉对他的任务越来越失望。他意识到整个行动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让自私的文化部部长踢开他的剧作家对手，从而占有可爱的 Christa。“我们是为了这个才走到一起的吗？” Wiesler 这样问他那玩世不恭的上级，上校 Anton Grubitz。



由著名德国演员**乌尔里希·穆埃**饰演的斯塔西上尉 Gerd Wiesler，
代号 HGWXX/7

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为从他的耳机里听到的东西而着迷；从这些掩藏在剧作家公寓墙纸后的窃听器中，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充满了文学，音乐，友谊以及温柔的性爱，和他的世界如此不同；他自己的生活在枯燥而孤独，在乏味的高楼大厦中度过，只有在一个中年妓女肥胖的两腿之间，他才能短暂而勉强地找寻到安慰；这个妓女的主要客户就是斯塔西的官员们。当 Dreyman 演奏起一首名

为“好人奏鸣曲”的钢琴曲时，Wiesler 坐在他设在阁楼的隐蔽处听得出神；这首钢琴曲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剧院导演送给剧作家的生日礼物，他由于自己的作品而被文化部部长禁止工作，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秘密的监视者违反了他在斯塔西自己的大学里教授过的所有规章，潜入剧作家的公寓并偷走了一卷 Bertolt Brecht (1898 ~ 1956。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剧作家，舞台导演，诗人。译注) 的诗集。接着，我们看到他躺在沙发上，开始读 Brecht 的一节悲哀的诗句。

这复杂而扣人心弦的情节最后达到了颠覆性的顶点，剧作家的女友将他出卖给了斯塔西，但我们的斯塔西上尉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使剧作家逃脱了曝光与被捕。他被降职到一个斯塔西的地下室里，用蒸汽拆开各种信件；在他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年轻官员，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部里的食堂讲了一个政治笑话，接着在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对话之后，他被上校 Grubitz 要求说出他的姓名和军衔。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剧作家读到了他的斯塔西档案，并从中推断出 Wiesler——在档案中被称作 HGW XX/7——是如何保护了他，然后写了一部小说，题目就叫《好人奏鸣曲》，和那首钢琴曲的名字一模一样。影片最后以一段诗意的画面结尾。时光已经走到了 1993 年，这位前斯塔西成员走进东柏林的卡尔·马克思书店，打开一本新出版的小说，发现这本书是献给“HGW XX/7，并致以感激”。“你想要把它按礼品包装起来吗”？商店营业员问道。“不”，Wiesler 说，“es ist für mich”——“它是给我的”。一语中的。故事结束。演职员名单开始。



“谨献给 HGWXX/7，致上最深的感激”

当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被强烈的震动了。但同时我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待这个主题：“不！这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这所有的一切都太过鲜明，太过浪漫，甚至都有些太过戏剧性了；在实际情况中，这一切都要更灰暗，更俗气也更陈腐”。比方说那个穿着棕色灯芯绒外套和开领衬衫的剧作家，他的打扮、行动和谈吐都象一个来自施瓦宾格——慕尼黑一个时髦的街区的西德知识分子，而不象是一个东德人。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错误。在执行日常任务时，斯塔西官员从来不会穿那种时髦的制服，也不会穿着那些闪闪发亮的及膝皮靴、皮带以及骑兵式的裤子。与之相反的是，在影片中，斯塔

西大学里的学员们都穿着普通的、学生式的平民服装，实际上他们应该穿着制服。一支斯塔西的监听队绝不可能在其目标所居住建筑的阁楼里设置工作点，因为这样肯定会把自己暴露给其他的住户——Wiesler 对剧作家对门的邻居冷冷地警告：“只要你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你的 Masha 马上就不能在大学里继续学医学了。明白吗？”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一定会被这种警告所吓倒。

同样，有一些语言也过于夸张和老套，几乎就纯粹是西方式的语言。在和文化部长谈话时，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剧作家都不会使用西德形容黑名单的 *Berufsverbot*。我在东德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有谁称一个女人为 *gnädige Frau*，一个老式的单词，其意思大约在“女士”和“我的女士”之间，而一个斯塔西上校根本不可能在审问中把 Christa 称作 *gnädigste*。我愿意出上我最后一个德国马克，来赌在 1984 年时，和西德杂志 *Der Spiegel* 相对应的刊物不会谈论到 *Gesamtdeutschland*。在我看来，这样的词汇表更象是流亡的德国贵族，而不是 1984 年时真实的东德；在二战尾声时，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的父母逃离了第三帝国的东部，这位导演兼作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但是，这些异议并非我的重点所在。重点在于这是一部电影。它借助好莱坞式的结构与惯例，对背景各异的观众们描述了在斯塔西统治下生活中的部分真实，以及这些经历所揭示的更大意义上的人类天性。它将历史事实（一些斯塔西办公地点是真实的，大部分术语和间谍技术也是准确的）与一个快节奏的惊险加爱情故事混杂在了一起。

当我在牛津和 von Donnersmarck 会面时——他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这里学习政治、哲学以及经济——我向他提到了我的保留意见。尽管他对电影在基本史实上的准确性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他马上就承认，为了达到戏剧性的效果，有一些细节被故意改变了。比如说，他解释如果他让斯塔西学员们穿上制服，普通的电影观众就无法对他们产生认同感。但现在他让他们穿着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还让他们中的一个（难以置信地）问“在审讯中恐吓人不是错误的吗？”这样所达到的效果立刻就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了代入感，并把观众吸引到故事中去。他争辩道，在电影里真实总是 *verdichtet*，这个词意味着浓缩、集中和强化，但同时又带有 *Dichtung* 的感觉，意思是诗意，或者更广泛的说，虚构。所以才会有那些高尚的语言（“我请求你，我恳求你”——*ich flehe dich an*——电影中剧作家这样说道，让他的女友不要再一次屈从于部长贪婪的淫欲）。所以整部电影都有着丰富的色彩，鲜艳的绿色、棕色以及微妙的灰色，以及那歌剧风格的 Christa 之死。

后来，在牛津一家电影院进行的问答活动中，导演在不同的地方提到了他所钦佩的两部电影：Claude Lanzmann 痛苦的大屠杀纪录片《浩劫》（*Shoah*），以及 Anthony Minghella 版本的《天才瑞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一部有关谋杀和盗窃身份的惊悚片——他把后者单列出来，是因为“它没有让我觉得厌倦，所以我很感激”。在《他者的生活》中，《浩劫》与《天才瑞普利》混合在了一起。Von Donnersmarck 对史实的确十分在意，但他更关注的是不要让我们感到厌倦。而因为这个我们也很感激。他并非一个东德的幸存者，而是美国化的西方世界里一个年轻的世界主义者，

操着流利的美国口音的英语以及好莱坞的通用语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东德的体验用一种表达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吸引到整个世界的注意。

当今最优秀的电影评论家之一 Anthony Lane 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一篇令人钦佩的评论，其中他改编了 Wiesler 的妙语——Es ist für mich——并以之作出结论。Lane 写到，你也许会认为这部电影是为今天的德国人所制作，其实并非如此：Es ist für uns——它是给我们的。他或许比他所想象的更为正确，《他者的生活》完全是一部给别人看的电影。就像德国制造的许多其它东西一样，它本来就是为出口而设计的。在它理想的外国消费者中，就恰恰有 Lane 的“我们”——《纽约客》的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纽约书评》的读者。



饰演斯塔西上尉的东德演员**乌尔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 1953.6.20—2007.7.22]

因《窃听风暴》影片中精准细致的表演而获德国罗拉电影奖最佳男主角、欧洲电影奖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他自身经历与影片相当重合，两德统一后**穆埃**在斯塔西档案馆翻阅自己的资料时震惊地发现，妻子和同事曾在 10 年间秘密监视过他，并把他的举动报告给国安局、而自己却一无所知，二人因此离婚。

整个事件对**穆埃**沉痛的打击，在影片中全情再现了那段锥心的记忆和非人道的时代，

穆埃获奖的当年因胃癌去世，享年 54 岁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遗失什么本质的东西？一些细微的不准确和不真实，换来了对更深层次真实的传达，在艺术上这是被允许的。但是，影片的确缺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这就是那些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4 ~ 1975。犹太裔德国人。西方当代重要政治理论家。译注）所引人瞩目地提出的，邪恶中的平凡；比起充满了纱窗、塑化木料的小屋与拖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更好的体现这种邪恶的平凡性。但是，正因为它是如此平凡，如此不间断，如此机械地让人厌倦，向不同背景的观众重现它就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或许一位伟大的编剧和导演可以创作一部关于厌倦的不让人厌倦的电影？在此我提出这个挑战。）

这部电影的主要论点之一仍然让人不安。这个论点就是在结束时所明显指出的，这名斯塔西上尉就是奏鸣曲中的那个“好人”。但是，我听说过有斯塔西的密告者在最后保护了那些他们所密告的人。我知道有些全职的斯塔西官员后来觉醒了，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在和前斯塔西官员们漫长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让我觉得可以被简单而明白地称作一个坏人。软弱，狭隘，机会主义，自我欺骗，一点不错；做出邪恶事情的人，基本如此；但从他们身上，我总能看到那些残存的可能性，那些在其它环境中也许能够生长的善良。**

尽管东德演员 Ulrich Mühe 的表演本身十分优秀而且高深莫测，但电影向我们展示的 Wiesler 本人的转变，看起来还是难以置信的迅速且并不完全让人信服。要溶化这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清教徒，我们得需要比那首奇怪的奏鸣曲和 Brecht 诗集更多的东西才行。在同时出版的一本书（包括电影的原始剧本）中的一篇论文里，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电影的历史顾问 Manfred Wilke 给出了和电影的许多方面相对应的史实，但他没有提供哪怕一个有据可查的作出类似举动的斯塔西官员——且不说他们还得逃脱相应的后果。在这里，他引用的是两个涉及到不满的斯塔西官员的案例，1979 年的一名上校和 1981 年的一名上尉，他们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并被处决。不过，我也可以接受这种转变与掩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上校 Grubitz 揭发了 Wiesler，他就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

好吧，和他之前做过的无数坏事不同，Wiesler 做了一件好事。但如果因此就得出他是“一个好人”的结论的话，只能说这是一个过头的艺术夸张——一个 Verdichtung。当评价生活在独裁下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面对背信弃义所带来的道德迷局；而在这个权衡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错误。一个是过分单纯化，非黑即白，摩尼教（重要的二元论宗教之一，起源于波斯国萨桑王朝（224 ~ 651）。译注）一般地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X 是一名告密者，所以他全然就是一个坏人；Y 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所以她全然就是一个好人。任何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事情要远比这复杂的多。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则正好相反，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但结果却是混淆了杀手与猎物的界线。**自由主义的西方并不缺少这一类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而且毫不奇怪地，在那些总带着玫瑰色眼镜观察东德的人身上它十分常见。随之而来的常常是这样一种看法，即斯塔西档案根本不值得信任：die Akten lügen，档案说了谎。Von Donnersmarck 本人远远不是这样，但他的电影却让人不安地接近这种相对主义。**电影中的“好人”是一名斯塔西上尉，他伪造了报告以保护一名艺术家。

这是一个错误，但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管怎么说，《他者的生活》所带来的最终效果并不是世界性的对前斯塔西官员的同情。它以一种时尚的风格，向那些对这个体制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观众传达了它所代表的恐怖。而且这又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且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所以，它是配的一座奥斯卡的。

根据 Der Spiegel 的一则报道，当奥斯卡颁奖典礼最终结束后，激动的 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参加了一场深夜举行的德国庆祝活动；他挥舞着他的奥斯卡小金人，兴奋地喊道，Wir sind Weltmeister！这个短语并不是指世界的主人，而是指世界冠军（比如在足球里）或是世界级的大师（比如在高尔夫里），同时又暗指着艺术上的成就，类似于 Meistersinger 或 Meisterwerk。不过说到底，德国究竟在什么方面是世界冠军？足球？也许。他们在去年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对战后的西德来说并不多见——带来了许多真诚的爱国主义庆典，这大概也是 von Donnersmarck 脑子里当时所出现的场景。出口贸易？当然是；不管它是出口到英国的 BMW，到伊朗的机床，到中国的流水线，还是偶尔出口的电影。《他者的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赚到了超过 2300 万美元的利润，对德国经济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小小收入。

有些人可能想要说——特别是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德国同样也是制造残忍的独裁统治的世界冠军。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死神是一位来自德国的大师——Paul Celan（二战后重要诗人之一。其代表作“死亡赋格曲”（Todesfuge）作于 1953 年，描写了他在集中营里的生活。译注）在他无以伦比的描写大屠杀的“死亡赋格曲”中如此写道。说到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德国毫无疑问是世界冠军，真真切切地击败了全世界。但我们可以对昂纳克的德国作出同样的结论么？的确，这个仅有 1700 万人的小国家可以看作某种心理胁迫的微缩版杰作。正如奥维尔所预见到的，完美的极权主义体系不再需要屠杀或是肉体上的折磨。我并不想轻视东德政权所带来的邪恶；但是，比起在斯大林的古拉格、毛的强制饥荒、以及波尔布特的种族屠杀中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人们很难说东德政权就是共产主义最糟糕的产物。

不同于纳粹德国，在更大的舞台上，东德不过是一个附带节目。斯塔西是按照克格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并非象许多人模糊的想象中一样师从于盖世太保。随着其它苏联集团的政权的文件被逐一解密，我们发现它们的秘密警察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或许斯塔西要更为出色一些，因为它是，好吧，德国制造；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存在着许多更可怕的恐怖。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斯塔西体制下这种微妙的心理恐怖之所以能够维持，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完全依赖于红军的存在以及苏联愿意使用武力这个先决条件。当这个条件不再存在时，斯塔西体制也不复存在。

那么，为什么是“斯塔西”这个词，而不是“克格勃”，“红卫兵”或是“红色高棉”，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在以各种文化手段复述各自国家所面对过的恐怖这方面，德国是真正意义上的 Weltmeister。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能够如此卓越、如此持久、如此创新地对自己过去的罪恶进行调查、交流和再现——以及再次再现，以及再次再次再现。

这种文化上的复述和犯罪者与受害者的特征都有关系。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古腾堡（1400 ~ 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注）的传人开始灭绝书籍的传人（“书籍的传人”（阿拉伯语为 أهل الكتاب，ahl al-Kitâb），又作“圣经的追随者”。这是一个神学名词，主要见于伊斯兰教，用于描述在穆罕默德

之前就信仰希伯来上帝的非伊斯兰教的信徒。此处显然特指犹太人。译注)。欧洲最有才能、最知识渊博、最有创造力的民族之一尝试着毁灭另外一个这样的民族;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他们都处于一种热切而多产的文化共生状态之中。(“德国人是犹太人的一个坏情人”,一名波兰民间木刻家这样对我的一个朋友描述道)。在此之后,两个民族都以前所未见的谨慎和艺术敏感记住了这一段惨剧。在 Celan 的“死亡赋格曲”中,这首德国诗歌低声回应着哈西德教派((Hasidic Judaism)希伯来语中为 חסידות Chassidus,意为“虔诚”。为犹太教一支,起源于18世纪初俄罗斯-波兰边境一带,主要在东欧犹太人中传播。二战中大多数哈西德教徒丧生于大屠杀。译注)的神秘主义;这种纪念形式本身就是德意志-犹太民族共生关系的一个新的胜利,一个由死亡中走出来的新生命。Celan 曾讲述过他所热爱的德意志语言是如何在“死亡演讲的无尽黑暗”(die tausend Finsternisse todbringender Rede)中幸存了下来。现在,他逃过了德国来的那位大师,这语言也通过他而再次重生。

至于共产主义,则是德国人自己对自己所实行的——尽管并不是在君主政体之下。古腾堡的传人压迫路德的传人。当这段历史刚一结束,兰克的传人又马上接手。**整整一代现代历史学家,在对纳粹的研究中接受了训练,现在又把他们熟练的技能应用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上。唯有西德的存在,西德的特点,西德对它自己艰难历史所进行的激烈的道德上的专业探求,才能够解释这种独特的对斯塔西现象的文化诠释。**(想象一下前苏联被一个民主的西俄罗斯所接管,而后者则积极准备着揭露克格勃的所有罪恶。)而现在我们有了电影的版本,它由一个彻底美国化的西德年轻人所制作。



影片导演**多纳斯马克** [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窃听风暴》是他的首部长片电影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认知学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对文字和图像的重复可以加强我们大脑中连接神经回路的神经突触，这些神经回路则负责着文字/图像与其意义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神上的联系变成了电化学上的硬件联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者的生活》直接涉及到了这些已经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联系。比如说斯塔西官员的制服，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只要一个德国人穿着一身普鲁士灰色再加上闪亮的长筒皮靴，我们的神经突触就会开始尖叫：纳粹。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看到，饰演 Wiesler 阴险的上级 Grubitz 上校的演员最早是以盖世太保的角色而成名的；那还是在 1984 年的西德舞台，在这部电影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真实的斯塔西日常制服，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廉价涤纶制品配上便宜的邮差式的靴子，这可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在电影所采取的这种戏剧性拍摄风格之下，剧作家 Dreyman 与文化部长周旋的场景让我强烈地回想起《摩菲斯特》（Mephisto）；这部 István Szabó（1938 ~ 。匈牙利著名导演。曾凭借《摩菲斯特》一片于 1981 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6 年，公众得知他曾为前共产主义政权的情报部门工作。有观点认为，该片就是他对自己这段生活的描述。译注）的杰出作品描写了一名演员-导演 Gustaf Gründgens，以及他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之间浮士德式的关系。又一个纳粹-斯塔西的回路联系在不知不觉中被触动。

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关键时刻，Dreyman 在钢琴上演奏古典的“好人奏鸣曲”，而 Wiesler 则通过他的耳机倾听。当演奏结束后，Dreyman 转向 Christa，大声说道，“难道任何听过这音乐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可能是一个坏人吗？” Von Donnersmarck 说自己是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段话里得到的灵感；在其中高尔基写到，列宁曾经说过他无法去听贝多芬的“神秘园”（Appassionata），因为它让他想要去说一些甜蜜而愚蠢的东西，去轻拍那些小人物的头，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敲打那些小小的脑袋，狠狠地敲打，这样才能够实现革命。作为一个一年级的电影学生，von Donnersmarck 想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强迫列宁去听神秘园的话会发生什么”，而这就是他电影的原创精华之所在。（Dreyman 实际上也引用了列宁的评论。）

这一个场景的灵感来自俄国。但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尤其是 Lane 提到的“我们”——究竟会有怎样的联想？我们当然会想到罗曼·波兰斯基（1933 ~ 。法国著名导演。多次获得奥斯卡等主要奖项。其代表作有《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1969），《中国城》（Chinatown）（1975），《苔丝》（Tess）（1979），《钢琴师》（2002）等。译注）的《钢琴师》（The Pianist），在其中一名德国军官被一名波兰犹太裔钢琴师所演奏的肖邦（Chopin）深深地打动，从而放过了他——正象 Wiesler 放过了 Dreyman 一样。无疑，我们也会想到那些受过教育的纳粹杀手，他们在晚上听着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音乐，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出门去杀害更多的门德尔松。他们真的听到了这些音乐吗？良好的教养意味着人性吗？我们又再度陷入了二十世纪最深的德国谜题，它在音乐

与诗歌中得到了最感人的传达。正是这些神经突触的联系，让《他者的生活》如此强烈地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

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制作这部电影的德国是这个地球上最自由与文明的国家之一。今天，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家园——例如英国和美国——来，这个德国里的人权和公民自由得到了更好的让人嫉妒和有效的保护。在这片善良的土地上，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新闻记者的调查技巧、国会议员的严肃认真、资本持有者的宽宏大量、神父与道德家的理想主义、作家的创作天才、以及——当然了——电影工作者的杰出表现，他们都联合起来，巩固着整个世界对德国与邪恶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的想象。但如果没有这些努力的话，德国就不可能成为如此善良的地方。在人类文化的所有记录中，难道还有比这更加荒谬的成就吗？

[【返回目录】](#)

龙应台：你是有选择的——评《窃听风暴》

[龙应台 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本文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作家龙应台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

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窃听风暴》电影海报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影片《窃听风暴》中的剧作家和同道的朋友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由马蒂娜·戈黛特饰演剧作家美丽的女友克丽斯塔，
一位知名的舞台剧演员，
被迫成为文化部长的情人，为自保而出卖了剧作家，
最终因悔恨迎向疾驰的客车自杀身亡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己，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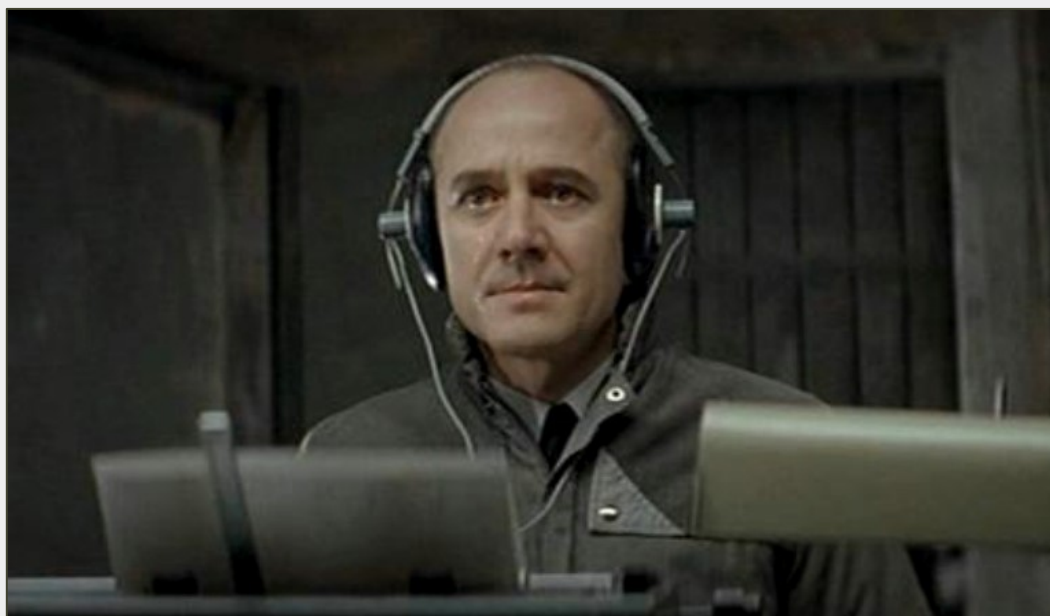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影片中，秘密警察魏斯乐，监听到剧作家弹奏的《好人奏鸣曲》时，落泪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

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守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

[【返回目录】](#)

贺卫方：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1-4-11 周末画报]



斯塔西档案馆里众多书架上密密麻麻的档案（贺卫方 摄）

被撕碎的罪恶之书

“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埃利希·米尔克 末任斯塔西部长

1989 年 12 月 4 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属于东德秘密警察机关“斯塔西”，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因德语 Staatssicherheit (国家安全)缩写为 STASI。这个恶名昭彰的机构自 1950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对内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然而当 1989 年东德政权开始崩溃之时，这个庞大的机构逐渐感到自己正在成为民愤的替罪羊，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有关极权国家压迫人民 40 年的罪恶记录，旦夕之间就可能被毁掉。

然而埃尔福特的火光却引起了一名正巧经过的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埃尔福特斯塔西大楼，强行从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斯塔西档案的行动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 年 1 月 15 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

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 16000 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 3900 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 180 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 年，统一后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档案馆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处理前共产国家秘密档案的国家机构。迄今二十年来，工作人员几乎全凭人力对这座“纸片之山”进行整理。他们首先根据档案纸张颜色、笔迹、墨水等进行初步分类，然后再尝试拼接。在最开始的阶段，一个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对出 10 页纸。而在第一个十年中，他们仅修复了 2.5% 的破碎档案，相当于 90 万张纸的内容。他们需要靠手工粘贴这些碎片，将碎片铺在大桌子上，然后核对名字、笔迹和签名，根据这些信息并使用打字机、镊子、放大镜，努力进行拼图，每一张纸都要花费 15 欧元的人力成本。而按这样的速度，整个修复工作将需要至少四个世纪。

为了加快复原的速度，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经过招标参与了电脑复原程序的设计。这个被称为“反碎纸机”的项目将是世界最精密的辨认设备，耗时 10 年，花费 600 万欧元研制，其还原文件的能力高达 80% 以上。传送带上的每一张碎纸片都将被双面扫描存档，通过分析纸屑的形状、颜色、纸质、厚薄等，定义它们两两之间的接近可能性大小，最终在电脑中拼凑还原成原来文件纸页的电子图像。虽然这大大加快了修复整理的速度，但是碎片拼好后，还需要人工校对。而如果用作法律证据的话，碎片仍需手工拼贴。

枕边的线人

“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

——斯塔西的格言

斯塔西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对内情报组织与秘密警察机构，自建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不是保障宪法和公民权益，而是不惜代价维护政权的稳固，肃清任何可能的敌人。这个可怕的组织曾经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公民；在 80 年代，平均每天就有八人被斯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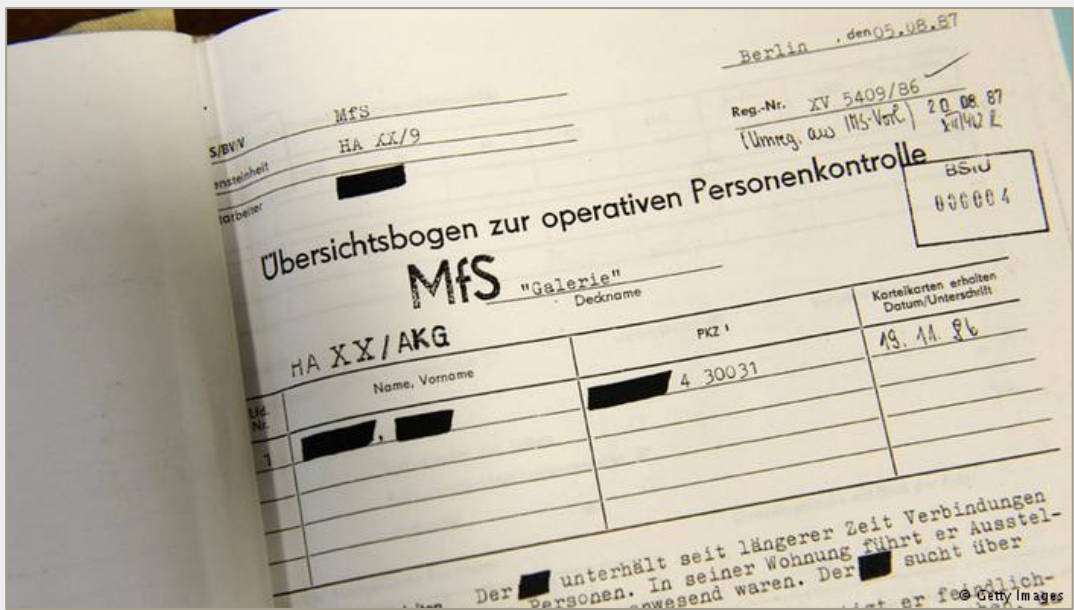
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环保主义者迈克尔·贝雷特斯在他祖国的生活犹如奥威尔式的黑暗，恰好可以说明斯塔西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在大学，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地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回应，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祖国就像一个深渊。而暗中为他设计这样的生活的，正是无所不在的斯塔西。

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贝雷特斯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一种激进的反对派。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分子，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地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

——作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民一员，他当然明白如果他对政府叫板的后果，因此他谨慎地拿捏着自己活动的界限。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仍然被斯塔西暗中监视，而执行这些任务的却都是他的平日熟人。而所有针对他的惩罚，诸如出境限制，同样也是秘而不宣的。

1992 年，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前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这本由斯塔西在两德统一前为他秘密写下的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经由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向组织汇报。像这样的个人秘密档案，有超过 600 万份，而当时东德总人口仅仅 1800 万人。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斯塔西早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自 1950 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 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 55718 人，1980 年有 75106 人，到 1989 年，则达到 91000 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而像贝雷特斯身边的这些“非正式合作者”（常简称“IM”），更是数以十万计。

学者约翰·科勒在其《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IM 的总人数可能接近 50 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 IM 总数可能高达 200 万人。这意味着每 6.5 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灵魂的寻人启事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可以想象，在迄今整整二十年的修复时间中，什么样的惊天秘密正在被一一复原。虽然德国历史学家认为，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恢复，将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幸存的文件碎片被解密后，已经对德国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一些家庭婚姻破裂，许多友谊也在一夜间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

这些秘密档案曾经供人们公开查阅。可是，沉痛的“真相”成为人性难以承受之重。秘密警察曾把 1800 万人口中的 600 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使这个民族拖着长长的心理阴影。

夺得 2006 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正是还原这一历史的精彩电影。从告密、出卖、伤害，到掩护、同情、转变。影片精彩地描述了一个冷漠的斯塔西秘密警察是如何在一次监听行动中良心发现，最终作出了人性的选择。电影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主演乌里希·穆埃的表演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也曾是斯塔西的受害者，被挚爱的人出卖。

穆埃曾经的妻子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最终离婚并成为陌路人。当《窃听风暴》上映后，穆埃向媒体自爆他曾经挚爱的简妮就是斯塔西的线人，曾经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已经卧病在床的简妮也不甘示弱，与穆埃对簿公堂，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穆埃从档案处调取了自己往日的机密档案来佐证时，简妮却突然撒手人寰，不久之后穆埃也辞世而去，让这银幕外的一切纷扰显得愈加无奈与悲剧。

早在 1991 年，德国议会即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希望了解真相是人的一项本能欲求。迄今为止，提交查看档案申请的德国人共有 170 万人，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 10%。很多人曾经担心，一旦受害者查看了自己的档案，从中发现了那些告密者，那些曾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人的名字，他们会采取报复行动，会有新的流血事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众面对真相时的态度比一些政治家所预言的要理性得多。

1993 年，前东德著名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被指认曾在 60 年代为斯塔西充任线人，专职监视文艺界的危险言论。曝光之后，她曾矢口否认，直到解密的档案将白纸黑字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称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说自己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

在黑暗的时代下，国家机器往往会成为不可一世的恐惧之兽。然而性本善的万千民众何以愿意示弱于专制与恫吓，甚至出卖正义感与勇气，最终成为铁血体制与思想控制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沉默、屈服和献媚，使得人性终结于蔓延泛滥的猜忌和怀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能发生的最让人痛心的事。二十年来，斯塔西档案的逐渐揭开，拷问的是数十万个有名有姓的良心。而在每份碎片档案中逐渐清晰的当年善恶一念之择，也曾是无数个历史的转折。 ■

[【返回目录】](#)

金雁：“追问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

[**金雁** 著名东欧问题专家，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秦川雁塔。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989 年东欧剧变前夕，罗马尼亚警察局、内务部和情报局档案资料被最高机关授意下的便衣烧毁，这样既可以使过去罪恶的历史无据可查，又可以嫁祸上街示威的学生，给镇压制造借口。其他东欧国家也都存在大量销毁档案的现象。

东德民众从剧变一开始对保护档案就有一种自觉的意识。1990 年 1 月示威民众占领了前东德国安全部的总部大楼，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们销毁档案，目前保存下来的告密档案大约有 185 公里档案柜长，大约 1.55 万麻包撕碎的档案，它们现在都存放在马格德堡，还有 47 公里长的胶卷，照片 160 万张。大量的卷宗详细的记录了告密的“线人”被招募、领取薪酬、跟踪、窃听、汇报的种种行径



1990 年，冲进柏林斯塔西总部的示威者

在东欧国家，如何对待前朝秘密警察和告密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保加利亚公布了内务部的档案，其中涉及了 400 多名外交部的驻外人员导致保加利亚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而苏联时期档案被称为“潘多拉的魔盒”，叶利钦时期开放了一段档案以后就又收紧了。

一些国家考虑到秘密警察的活动范围涉及人群广博唯恐档案公布以后导致社会波动、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甚至销毁、封存档案，试图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种行为主张清算，2009年在“黑色星期六”罹难的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1981年曾因团结工会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关押，这段经历让他对秘密警察制度深恶痛绝，他甚至不惜在此问题上与主张“既往不咎”的瓦文萨分道扬镳。



斯塔西的标志

他当选总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审查当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发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残余，要求公务员、大学教师、媒体人员等公开声明当年是否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并促使议会通过《清查法》，此举涉及甚广，据说牵扯到70万余人，一时之间在东欧引起很大的震动。德国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档案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不同与波兰的独特经验。

剧变以后，在东德遗留下来档案基础上于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档案委员会，起初它只有52名员工，现在已发展到1600人。委员会的第一批信息被用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对职员进行核查。

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档案法》开始实施，该法律至今已进行了七次修订。从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

斯塔西档案委员会的任务是将斯塔西的结构、任务和职能公之于众，从历史、政治、司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处理红色专制遗留问题。档案委员会通过公开提出如何处理历史问题，促进公众参与对集权主义及其结构的讨论和反思，从此开启了“正视历史”的过程，把斯塔西变成一个唤醒记忆的场所。

由于斯塔西侦听、跟踪、摄像和私拆信件档案严重地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这些档案文件与普通档案不同，是要依据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谨慎处理的，档案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

档案法》中特别提出的规定。档案委员会总部在柏林，并在前东德的各区首府设有 12 个办事处，分别保存当地的档案。2011 年 9 月 30 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修正案，其中第 33 条 a 款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任职，修正案还对公务人员的核查规定进行了修正。

几年前我们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走访了德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专程去前东德的国家安全部进行了参观和座谈。斯塔西档案馆馆长杨·罗兰德先生带我们参观这个曾经畸形发展的庞然大物。下面一些数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质：斯塔西是东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过其他部级机关的总合，有的国家部委只有 1 栋大楼，而斯塔西却有多达 49 栋建筑物，约 9 万正式员工和 19 万的“线人”队伍（其中 1 万人是未成年人，2 万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来就是纳粹法西斯人员）这两项相加约占总人口的 2%。

它曾在国家的地位绝对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剧变前夕，大量的档案已被销毁，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到机器发热报废以后，国安就发动人海战术，动用人力用手撕碎档案，当愤怒的人群冲进斯塔西大楼时，尚有 1.55 万麻包碎屑未被彻底销毁，而把这些碎屑拼合起来大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在斯塔西展馆里有一种特殊机器叫“拆信机”，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邮局里分拣出来的人可疑信件进行拆封拍照，这种机器 1 小时可以拆 300-500 封信，一般来讲，出入境的信要全部要拆开拍照，国内的信件受到怀疑的要拆开拍照，在机器作业的协助下，东德国安每天约要打开 9 万封信。



斯塔西总部

坦率地说，在来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毕竟已经看过斯塔西的母体——苏联的克格勃总部机关卢比扬卡，但是在参观完斯塔西后我仍然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不寒而栗的心灵震撼，这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结构严谨、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德国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真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的理解到，为什么说“专政机器是万能的”。

斯塔西橱窗里有三句话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参观者心领神会哑然失笑：第一句是“秘密警察是无所不知的”；第二句是“这些内容不能在电话里讲”；第三句是“看起来很稳定”



装有斯塔西秘密档案的 1 万 5 千个袋子

“它是我们反思的宝贵财富”

以下是我们在与斯塔西档案馆管委会人员的座谈。

问：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国-安的拨款是多少，东德政权的最后一年国-安费用占国家预算的多少？肩负有特殊使命的“线人”的分布状况是怎样的？

答：拨款数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庞大，因为既然是秘密警察，很多经费来源都是用民用的名义来支出的、不公开的，总之秘密警察队伍的开支无疑是国民经济支出中很庞大的一项。线人的密集程度在各个领域有所不同，国防、军工、涉密单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线人分布比较密集。

问：红色专制时期“线人”的人数是多少？被监视对象的人数是多少？与 30-40 年的法西斯监控犹太人的行为相比，哪一个更厉害？

答：1989 年时大约有占总人口 1/95 的线人，18.9 万人，具有线人行为的数量会更大，但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盖世太保时期告密的人多于斯塔西，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也要远远大于东德人数，在种族优越论的大肆宣传下，整个民族都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 30-40 年代大约有 60 万人有线人行为。东德时期“主动告密”的绝不是少数，自愿告密者认为，只要充当了政府的眼线，起码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线人背后又有线人，盯梢者背后又有盯梢者。不但民间如此，所有的高官更是被建立了秘密档案，只要政治需要，在台上受万人仰慕的大人物沦为阶下囚只在瞬间。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可知的恐惧中，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装在卷宗里的“黑材料”。

问：斯塔西档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 年是如何发生逆转的？

答：斯塔西的档案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国家建立这样庞大的系统是在为自己服务，它不可能自己骗自己，所以绝对具有可信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馈。

其实 1987 年国安和秘密警察就给德共中央上书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抵挡一阵子。总之，控制“公共话语”的能力在不断递减，投入和效率越来越不成比例，要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否则我们就抵挡不住了。斯塔西向来称自己是国家的矛与盾，是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他们发出这个信息说明国安自己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好，专政机器已经运转不灵了，只有他们知道这个表面上坚固无比的体系内部是多么脆弱的。

东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墙”，从 1961 年柏林墙建立以来，逃亡问题就一直无法根治，国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逃，最后几年东德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外汇以保证柏林墙的屹立。80 年代末整个东欧都动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也走上了街头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使统治者意识到不能照样维系下去了。

1989 年我们这里发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中国的事情让我们感到震惊，克伦茨的表态，使我们认识到一旦我们行动起来，他们会动用武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认为，这场公民运动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问：斯塔西与克格勃相比有什么特点？它的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导？有没有关于普京的档案？东德在国民经济中计算机的运用比较普及，在秘密档案中是否如此？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体，它的出现当然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阵营专制国家或多或少都从苏联学到一些东西，按它的体制建立的。就主导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东德也有自己的特点，德国人发达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它显现出来的缜密、科学计划、严谨、管理细致、记录完整、档案资料庞大且井井有条是其它同类国家无法比拟的。所有的侦听、私拆信件、监视、拍照、录像和跟踪工作环节以及领取报酬都有完整的记录卷宗，有案可查的。

但是东德杀人不多，从 1956-65 年因为告密而获罪被杀害的有 67 人，不像苏联大肃反那样大规模杀人。这可能就是德国特点，档案的完整性对剧变后的甄别工作也非常有用，它可以还原出更为真

实的历史，比如像波兰、捷克之类的东欧国家，剧变以后的档案遗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见不得人秘密工作档案被大批销毁，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讲不清楚了当然东德也把最关键精华的部分给毁掉了。之所以现在一定还原撕碎的档案，说明它的价值意义非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为了控制人而制造出这样庞大的监视系统，制造出这样一种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在苏式体制中苏联人是老大，东欧国家中有许多铁杆“亲莫斯科特工”或者“双料间谍”，他们会把国内的情况率先通报给苏联人。一般来讲，兄弟党都不敢搞苏联人的情报，因为这样弄不好会砸了自己的饭碗。80 年代的时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讨论，要不要搞电子化、数码化，这样从管理和节省人力的角度说，会大大提高效率，但是从保密的角度考虑，害怕泄密，害怕新技术的扩散面大，容易被人窃取，所以虽然也引进新技术但是进度很慢，使用起来也非常谨慎，也正是这种“落后优势”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档案，在所有的碎纸机连续工作报废以后，人工撕碎毕竟要慢得多，且留下了 1.55 万麻包碎片。否则计算机上一个指令“删除”就什么也留不下了。德国人都知道第三帝国留下的是“如山的军队”，东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档案”。



柏林斯塔西博物馆陈列的斯塔西监控所需的装备

我们接管斯塔西的时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专业人士严重短缺，因为档案数量太庞大、种类太混杂了，既没有任何索引，也没有归类编排，刚接手时完全没有头绪，全靠我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目前我们档案管理委员会现在有 1600 人，联邦预算每年有 9 千万欧元的拨款，主要用于员的工资和材料费用。档案的整理和碎片复原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人员心理负担很重，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突破人类心理底线的记录，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要进行培训和心理帮助，并适时调整工作。

问：如何使用斯塔西档案？会不会有使用不当的负面作用？

答：我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约束，立法清晰，考虑到了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政府机构不通过议会就无法使用这里的资料。这里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严守保密协定，进库必须是 2 人同时在场，有严

格的登记手续，不能查阅他人档案，个人档案中涉及其他人的部分都被涂黑，因此不会出现以档案敲诈他人的现象。

问：现在联邦的国安是否利用这里的资料？是否进入绝密档案要由内政部决定？

答：在统一合约中提出一个说法：“我的档案是我的东西”。1991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这句话被写进统一合约中去。2011年9月30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对《斯塔西档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条规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员在档案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同时对前公务人员核查规定进行了补充修订。



影片《窃听风暴》剧照
故事接近结局，剧作家在斯塔西档案馆查到真相

1989年时有人提议从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西德当时要求我们把档案搬过去，但是争议很大，最后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员会，建立“斯塔西博物馆”。现在有关纳粹历史的档案是可以借阅的，关于斯塔西档案的使用情况，议会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还会有所变更。我们的宗旨是既要有利于使用又要保护个人的隐私。我们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网站，发表、出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并定期发表信息，但是对媒体的报道不出面加以评论，不干涉公共舆论。

问：现在斯塔西档案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档案现在成为我们反思历史的宝贵财富。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的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记它并不是强调仇恨，而是为了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屏蔽真相，遮盖真相，歪曲真相，以记忆模糊叫人遗忘，以谎言代替真相，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从什么样的历史中走来。

问：有些国家的《国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国家安全机关有“采取技术侦察”进行调查的权利，怎样界定它与违法行为的窃听呢？

答：必须要有相应的细则规定，对所采取手段的限制和应用程序的司法根据。否则，任何违规的行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无限扩大，东德不也是在“为了祖国”的名义下发展出庞大的线人队伍。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即便受到侵权被窃听公民的行为被发现，受害人也无法诉诸法律程序。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在这些在法律条文中严格划定了监听的主体、使用条件和程序，同时也明确了各种非法监听的法律后果，以规范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窃听公民的行为。

公开监听以及其他侦讯手段的伦理讨论对整个社会都有启迪意义。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就是根据斯塔西的原形拍摄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产专制时期国安渗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缺乏法律支持的侦讯行为无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行人与人背靠背的相互监督，导致社会伦理价值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无底线”突破。

众所周知，是柏林墙和斯塔西导致了东德的垮台，它损害了统一社会党的公信力。这种把所有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靠“圈禁”起来和“特务政治”的“维-稳”手段一经公开，民德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践踏人权的现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经不起“公开性”拷问的。另外，控制社会的成本越大，链条越长，就越不真实，分析辨别的能力就越差，体系便容易走入“情报误导、误判”的死胡同。

从这一点说保留斯塔西档案的必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为了“让我的档案只属于我自己，以后每一个人不再成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管委会的工作是令人钦佩的。正如他们所言：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丑恶的部分。人类文明是一条羊肠小道，旁边充满了沼泽、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们要避免糊里糊涂的“向前看”，告诫人们不要不长记性地重犯过去的错误。

东德谈之色变的怪物“斯塔西”已经死去，但是在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兴风作浪，对此我们要谨记斯塔西管理委员会罗兰德先生的话：“历史与现在有绝对的联系，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有什么样的公共记忆就已经预设了未来的道路”，“在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尊严的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爪下的罪恶”。 🇩🇪

[【返回目录】](#)

王克勤：从疫苗事件看中国疫苗安全问题及疫苗管理制度

[王克勤 著名媒体人。本文为作者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第 549 期天则双周学术论坛的主题发言]



王克勤在双周论坛做主题演讲

到天则主题发言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当年出租车的报道，也是盛洪老师、曙光老师、茅老师说我来说说，我就来讲了关于出租车行业垄断导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众利益严重的损害。今天有幸再次受到天则所的邀请参加这次的双周论坛，并且很荣幸盛洪老师亲自主持，十分惶恐，在这谈关于疫苗的问题。

我先给大家介绍两个人，陈涛安是陕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因为举报山西疫苗被免职，是中国第一个免疫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研发者，最主要的身份是山西疫苗事件的揭露者、举报者和中国疫苗管理制度的推动者。前不久山东疫苗出问题之后，国家层面终于受到了感触，提出要对疫苗条例进行修改。山东疫苗出问题，包括六年前山西疫苗出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中国疫苗管理条例存在制度性的漏洞。六年前、七年前老陈就有这样的想法，六年前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当年老陈就提出说疫苗条例存在问题，山西的孩子们受到了疫苗关联因素的伤害，疫苗存在不安全。当年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山西疫苗的问题不能解决好，尤其疫苗条例不能改革和修订，山西疫苗事件将在中国很多地方再次上演，非常遗憾，这句话变成了现实。从去年到今年，山东境内的疫苗以祸及到全国 24 个省，恰恰说明疫苗的公共卫生安全制度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杜绝。好在持续呐喊和呼唤下，疫苗条例修改已经进入议程。

六年前开始，老陈写了一个关于疫苗条例的草稿，从 2010 年持续的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疫苗条例修改的建议案，直到今天终于有了回应和结果。所以，特别介绍一下陈涛安，陈涛安为中国的疫苗安全，疫苗的公共系统的完善做了大量的工作。严格的讲，他在过去 20 多年里持续在围绕“疫苗”两个字工作。好多人说陈涛安持续不断的举报，为什么没把他给抓了？各地举报者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被抓，可是陈涛安为什么没抓？陈涛安没抓因为他是红二代。陈涛安的父亲是当年攻打太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父亲的部下和很多一起共事过的人都在北京比较高层的体系里工作，每每陈涛安有问题有困难的时候，北京的红二代们会为他站位、为他站台、为他打气。山西方面多次要收拾陈涛安，但是自始至终投鼠忌器，是诸多举报者中迄今为止可以正常生活的为数不多的人。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举报，从来没有停止对公共问题的推进。当年山西疫苗问题之所以可以做得出来，我就是做调查，核心工作、大量的工作是陈涛安做的，陈涛安做的工作比我做的多得多。其实今天的主讲人是陈涛安，他在这个领域是很专业的人，很懂行的人。

陈涛安旁边这位是山西一个疫苗受害者家长，叫赵国平，太原周边一个县的疫苗受害者家长。

我做了将近 30 年的新闻记者，我还是从记者角度谈谈当年的山西疫苗和山西疫苗事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山西疫苗事件我称之为“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以及引发的思考”，分六个部分，首先对于山西疫苗事件做一个回顾。山东和全国大范围出现疫苗问题，背景是在六年前就有大规模发生过的山西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事件，有个视频给大家放一下，是酷 6 的网友在 2010 年清明节做的一个视频，对于整个视频我的态度是过于情绪化、过于文艺，但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播放视频）

这个短片是 2010 年 3 月份山西疫苗事件报道出来以后，大量媒体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状态下，酷 6 的网友专门在清明节做了这样一个短片，短片比较直接的表达了疫苗关联受害家长内心的诉求和强烈的情绪。

2009 年我在陈涛安的帮助下，在山西境内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发现大量的与疫苗有关联，致死和致残的孩子情形。在 2010 年的 3 月 17 号报道发表之前，了解到的信息相对有限，是 78 个，死亡的查到的是 3 个。报道之后到 4 月 30 号为止，我得到仅山西境内死于与疫苗有关联的孩子是 19 人，与疫苗有关联有大量证据佐证的是 159 户人家。死亡的情况比较多，我在这里不具体讲。还有大量的致残，发病前不久均接种疫苗，就像这个女孩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和陈涛安一起去的，在山西大同市天镇县有一个叫顾家湾的村庄里面，抱着这个小姑娘的人是她姥姥，拍照片的时候是 2009 年 12 月份，2 岁，我给她取一个名字叫燕燕，因为没有办法用真名，基于对孩子保护的原则。我当时拍照片的时候孩子没有任何表情，她姥姥告诉我说这个孩子不哭、不闹、不笑、不玩、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孩子像个植物人。这是她姥姥的原话，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很难

受，很不舒服。这个孩子怎么成为植物人的呢？她半岁的时候村里的医生给她接种疫苗，孩子就睡觉，持续昏昏沉沉睡了 24 小时，推醒还睡，家人觉得不合适，就送到医院，医生告诉家长说这个孩子没问题，好好的。把孩子抱回来又昏睡 24 小时，再把孩子强行推醒，孩子喷射性呕吐，把孩子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孩子脑子坏了，县医院医生也查不出病因。从这开始，这一家人带着孩子从县医院、到大同市医院、到太原医院、到北京医院、到上海医院，四处问药求医，跑了一年查不出病因。原来这家是养牛专业户，把赚的钱全花了，把要修房子的钱也给孩子治病了，最后把整个家庭拖垮了，这样的故事很多。

这个家庭被称之为中国最倒霉的家庭，老大被疫苗了，老二被奶粉了。老大接种疫苗以后，小学一年级就上了三年多，前面说的后面就忘了，最后没辙，夫妻俩生了老二，为了让老二以后能够照顾老大。为了让老二茁壮成长，父亲母亲给孩子买了三鹿奶粉。我见到这个小孩的时候，三岁的孩子，一路走来，穿着开裆裤，一路尿。老大被疫苗了，老二被奶粉了，老爹被维稳了。害怕高长洪到北京上访，上海搞世博会，怕他去上海，高长洪在附近铁厂找了一个开车工作，他出门的时候窑洞门口守着四个乡政府干部，他们的车把高长洪送到铁厂开车，每一个小时，乡干部去里面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去上访。高长洪这一家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回来以后，中青报的记者专门采访这夫妻，写了“中国最倒霉的家庭”，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让这个家庭遭遇到了。

山西当年的疫苗问题，不是生产环节问题，是流通环节问题。问题出在哪了？山西疾控专用。山西主要是二类疫苗出问题，根据疫苗条例，二类疫苗可以托管给企业，在这样制度安排下，2005 年一个自称是卫生部部属的大型疫苗专业公司来到山西，实际上是卫生部领导在里面起作用，跟山西卫生厅打招呼，跟山西疾控中心签署合约，垄断了全山西 3800 万人生命安全的疫苗监管、运营、经营权。关于疫苗我做一个背景解释，学理方面不讲，核心就是预防疾病。接种育苗是让我们防止流行病和疫苗的穿透，必须接种安全、有效、无危害的疫苗，才能保障孩子安全，尤其 3 岁以下孩子是高密度接种，一个孩子出生当天就要接种 3 支疫苗。

疫苗托管给这个公司之后，这个公司为了获得在山西全境疫苗的绝对垄断，他认为跟陕西省卫生厅和疾控中心签合约不行，他在每一个疫苗的包装盒上贴一个“山西疾控专用”的标志。这就涉及到技术问题，小包装盒的疫苗装在中包装盒里面，中包装盒的疫苗装在大包装箱里面，并且要求在冷链系统，冷库、冷藏车、冰箱、冰柜，整个冷链系统运行，以保障疫苗安全。怎么办？在冷库里面有一层霜，大部分疫苗在 2-8 度，一部分疫苗在 0 度储存，在冷库储存粘不上去，粘上去就掉。再一个在冷库里人不适宜长时间工作，于是，本来应在全密闭、全冷链系统的疫苗，从冷库里拿出来，拆开大包装箱，再拆开中包装箱，再拆开小包装盒，在每个包装盒上贴标签。这个作业短则四个小时，长则八个小时。山西省疾控中心技术人员敢出来讲真话的人跟我讲，大热天，大家穿着短裤，雇农民工在院子里面贴标签。这就形成了卫生部不得不承认的山西境内存在大量的“标签疫苗”，既然存在“标签疫苗”，就意味着卫生部不得不承认，疫苗涉及到非常严重的高温暴露问题。一个是高温的温度，不是冷链状

态，二是不能被光照，疫苗有这个要求。我们当时揭露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山西省卫生厅要求全省各医疗机构接种点必须要坚定的接种“标签疫苗”，帮这个皮包公司做推广业务。

两个问题，第一，山西境内出现了大量接种疫苗之后出现的致死和致残事件。第二，山西境内出现了疫苗管控上的严重问题。这是陈涛安当年举报的，也是通过山西省当地媒体记者介绍到我这里，我认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山西全境多少人生生死死的事情，于是进行报道。当时搞了两个多版，后面还有好几个版的报道。

现在说一下当时的报道，这个报道做的有点难，我进入山西境内调查是在2009年9月份，9、10、11、12四个月，到元月份还在进行。稿子基本搞好了，按理说元月下旬到2月份就可以发表。我在调查过程中深刻感受不是哪一个干部有多坏，不是哪一个公司有多流氓，背后有深层的原因。中国的疫苗条例存在制度漏洞，正因为制度漏洞，在山西境内造成山西疫苗事件的这个公司的老总，在山西推动他的“标签疫苗”的同时，已经与山东和内蒙古签署合同，准备在山东和内蒙推广他的“标签疫苗”。所幸陈涛安举报，中止了内蒙和山东的合作，我认为仅报道山西境内事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漏洞上去遏制疫苗问题的再生，这是更大的工作。我们意识到要推动全国人大重视疫苗的安全，并推动疫苗条例的修改，这是当时我的一个基本判定。

为了保证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不要因接种不当的疫苗而导致一系列事情，选择在两会前刊发，我找到总编辑，总编辑跟编委会成员商量，总编辑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他说这个事情有三方面很要命的问题：第一，事关人权问题。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涉及到严重的人权问题；第二，疫苗。疫苗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关键词，《经济半小时》在2008做过山西境内疫苗价格混乱的报道，报道拍摄完成，但是不能播出。卫生部启动相关的程序，就不能播出；第三，孩童新闻最能刺痛公众，容易引发公众问题。所以，因为这三点不能刊发，我天天找总编，总编说不行，说报社要关门，我们会因为这个被抓起来。当时我很着急，说这涉及到整个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说这个报社是因为理想存在的，现在曾经是理想的高地，今天变成这样。我曾经写了至全体编委的一封信，声讨大家，总编辑找我谈话，说你这个稿子什么样？我说我采访了卫生部，采访的山西省委，采访了山西省卫生厅，灭口程序随时启动，中宣部一个电话你就不能刊发了。我说这不是一个报道的问题，是涉及众多孩子生命问题。总编辑说这个稿子一定发，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现在不能发，这个时段发出去还了得？熬，熬到两会结束。两会结束之后，温家宝同志讲要创造条件为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讲话刚刚结束，我们立即落实温家宝同志的讲话精神，把报道刊发了出来，中宣部恨的牙疼，拿你没辙。为什么？他总不能跟温家宝、政治局常委对着干吧？我给各个学校，包括新闻界的记者编辑讲，重大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刊发的时点，在合适时点发出来，你是安全的，在不合适的时点发出来，你是找死。

这个报道发出来之后，新一轮的博弈开始了，230 多家媒体进入山西，云集太原。《南方都市报》发了六篇社论，这个事情比奶粉的事情大，很多孩子不吃奶粉，有的人一辈子不吃奶粉，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接种疫苗。奶粉通过消化道，疫苗是通过血液系统，两者之间差距太大。疫苗出来会引发全民惶恐，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不否认，好多人借此一直骂我，我说你骂吧，但是山西疫苗不安全问题，国内疫苗不安全问题是存在的。舆论热度长达两个月，比山东这次要热得多，民众关注疫苗安全。我最纠结的是很多年轻母亲打电话给我，说王老师，我的孩子明天接种疫苗，你说接种不接种？我当时很纠结，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应对。接多电话以后，经验总结出来了，所有来的电话我说：第一，坚定不移接种疫苗，因为有防范总比没有防范要好，这是我总体的概念；第二，如果你家境尚可，建议你接种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疫苗。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我不能保证它的安全，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认为发达国家的进口疫苗相对安全系数要高，根据我所掌握的有限的资料显示。

新一轮博弈开始了。杨继绳老师说是一家报社和三大流氓集团的博弈，这是杨老师的原话。一家报社和中国三大流氓集团——山西流氓集团、卫生部流氓集团再加上新华社流氓集团的博弈。说克勤你们跟三大流氓集团斗，最后打个平手，本来就是赢了，你还想怎么样，没有把你抓进去就不错了。现在想起来，杨老师还是看的深，看的透，没把你抓进去就不错了。

先说我们跟新华社的博弈。3 月 17 号我们报道出来之后，各门户网站前三条基本上是山西疫苗的报道，当天下午卫生部和山西方面应对。山西方面说“报道基本不实”。更强大的是新华社第二天晚上刊发一篇文章“还原山西疫苗事件真相”，新华社这篇报道写的特别牛，貌似很专业。山西吕梁地区柳林县 36 岁家长王明亮对新华社记者说，山西临汾市的家长某某某对新华社记者说，山西太原乌江县的赵国平对新华社记者说，全是这种口气，给人感觉特别真实。所有我报道里的这些家长，神奇的新华社记者一天之内完成了所有家长的采访，然后，他们觉得可以把这样的小刊活埋了。我觉得新华社的思维还停在非互联网时代，觉得用他的一张嘴把所有嘴都能堵掉。很遗憾他们不能与时俱进，现在整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大量媒体云集太原，网络上各种声音都有。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家长也赶到了太原。然后《南方都市报》、《东方京报》、《成都商报》的就采访李国平，说李国平你跟中国经济时报的老王那么说，你跟新华社记者这么说，哪个是真的？王明亮也遭遇这个问题，很多记者说你到底跟老王说的是真的，还是跟新华社记者说的真的。王明亮气炸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新华社记者，我不知道新华社记者长的什么鸟样。家长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记者利用了。这个做法很流氓，当然不是一个事件这样做，很多事件神奇的新华社记者都这样做，我说新华社记者神奇，说他流氓还是对他比较含蓄的定义，为什么？比流氓更进一步的是协议，2005 年的山西境内矿难频发，新华社山西记者长期扮演什么角色？发生矿难了，新华社记者说你这个事情给 30 万、50 万，我给你把所有媒体摆平，这个事情就抹了。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记者网，有一个曝光台，新华社山西分社很多记者榜上有名，两头拿钱，拿的是血

金，钱里面流的是矿工的鲜血，矿工的灵魂在呐喊，新华社的记者就把金元宝拿在家里面，不害怕来索命吗？所以这已经不是流氓的层级，是邪恶的层级。我说流氓，已经是对新华社记者很给面子的说法。

讲山西搞我们的事情。山西方面说“报道基本不实”，连续通过新华社发文章。与此同时，卫生部不断说山西疫苗是安全的，中国疫苗是安全的，没有任何问题，个别媒体和记者别有用心。很多人打电话说王老师你别有用心啊，卫生部官网就是这样写的。很多人担心我请我吃饭，为了给我送行，弄不好王老师哪一天就走了，提前吃个饭，送个行，以表达这份关切。我当时也感慨万千，这个压力很大，压力重重，一方面是山西卫生部、新华社在大放厥词，另一方面报社接到我们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通知，《中国经济时报》不可以就疫苗问题发表任何报道和评论，把我们的嘴封了。

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签发稿子的总编辑找到我，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得还击。我说还击什么？通知来了，不让我们写报道。他说你不是有博客吗？那时候微博刚刚起步，我当时没有微博，你写博文。我就开始写博文，中午写博文，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来，我就到他办公室去了，他说克勤你有没有想到，中心领导水平比较高，中心领导说《中国经济时报》报纸不能发表关于疫苗的报道和评论，但是并没有说我们网站不可以，他说难道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网站回应他们吗？于是我们发表了《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的声明》，这个声明说的特别硬气，对山西方面说我们报道基本不实表示强烈异议，我们愿意对报道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我当时也发表了一些声明，当时我们的态度很强硬。

与此同时，疫苗关联的受害者受到了一系列的跟踪，有人声称给老陈的腿砍了，王明亮送自己哥哥到北京住院、看病，警察追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去。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一方面是跟山西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声明发表之后，山西省卫生厅和山西省宣传部觉得势头不对，这个报社怎么态度这样强硬？19号下午5点左右，山西省委一个副部长带着卫生厅副厅长一千人等来到报社会议室交流，他们来勾兑、公关的，怕我们进一步动作。坐下来时间不久，我们报社明确表态，进一步报道现在没有马上准备刊发，还是留有余地。山西省卫生厅副庭长当着大家的面又开始说谎话，用若干谎言圆一个谎言。在他圆谎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太无耻了，就到我的办公室去，把他在三年前一个会议讲话材料找出来，因为我在山西耗了半年，搜集了大量材料，我说各位，我在这宣读一个李书凯庭长在xx年x月x日的讲话，正好那个讲话可以把当天他的讲话推翻。我读了几段，李书凯的脸色发青、白了，等于我把他的短裤扒掉了，李书凯非常尴尬，再加上我拿出大量的证据。李书凯摇身一变，开始鼓吹王老师，他在网上搜了我很多资料，阿谀奉承，搞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很有意思。

山西一方面进京做工作，另一方面卫生部态度一直很强，持续的说孩子们没问题，这些人跟疫苗无关。说的很多之后，就是整个疫苗安全没有任何问题。他本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卫生部怎么自己给这个事情一个说法？我觉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站出来可能是比较得体的，中国卫生部自己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好多人感觉报社的压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弄不好报社就关了，有一

些媒体朋友和记者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讲话，中国管疫苗最高的行政长官王宇的讲话，王宇说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严重影响预防疾病的效果，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这是东方卫视在 2010 年两会期间的一个报道，这期间正好卫生部官网每天在说中国疫苗是安全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媒体记者找出了这个报道。

(播放视频)

这个视频当时等于是救命的视频，当时整个卫生部整天说中国疫苗是安全的，个别媒体居心叵测。当时确实极不安全，我收到这个视频之后，把报道的地址给各个门户网站，2010 年 3 月上旬两会报道，在 3 月中旬、下旬开始又推这个报道，各个门户网站前几条，国家疾控中心主任说国产疫苗不达标。这等于疾控中心主任把卫生部长的脸打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什么都不说，用疾控中心主任的话讲。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形，疫苗事件闹的沸沸扬扬，卫生部派了八个专家进入山西对山西疫苗进行调查，然后出现很有意思的“马赛克专家”。4 月 2 号，山西卫视报道山西疫苗热点问题解读，说卫生部八个调查组分赴各地指导协助基层卫生部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几位端坐在座谈席的专家，领上均被打上了马赛克。所以我们这个土地上很神奇，一些事情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卫生部后来搞新闻发布会，跟我们报社说不准王克勤进来。

疫苗问题全面引爆。3 月 30 号开始，江苏 21 万份假狂犬疫苗流向市场，涉及 27 省接种。全国各地疫苗关联患儿家庭纷纷提出质疑和申诉，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我办累计收到资料详实准备投诉达 305 例，其中死亡 18 人，山西 159 例死亡 12 人，其他 146 例，死亡 6 人，涉及全国 24 省市。山西疫苗的问题是山西二类疫苗在流通环节的问题，王宇讲话说明了什么？我们的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在生产环节就存在问题，就存在不安全。今年山东疫苗出问题后，很多专家出来说我们流通环节出问题了，个别小摊、小商、小贩因疫苗混乱运销导致疫苗不安全。王宇是中国疫苗最高专家，疫苗疾控中心的主任，如果王宇的讲话成立，也就是说中国疫苗既存在生产环节的问题，也存在流通环节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对疫苗和公共卫生安全产生强烈的担心。

6 月 13 号卫生部发言人说要打击和遏制一些个别媒体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信息，要建立媒体记者黑名单。有人说王老师你就在黑名单上排在前面。我觉得挺搞笑的，我认为卫生部长应该上黑名单。为什么？

(播放视频)

刚才这个视频是辽宁的上访人杨玉奎（音）当年在卫生部门口上访的时候，跟卫生部门口保安发生肢体冲突的一些视频资料。杨玉奎后来见到我说的原话，“说人民群众感谢卫生部，我们欠揍”，这个话很有讽刺意味。

更神奇的是一些部委，只要媒体报道出了问题，他不反思自己哪个环节出问题，他说这是记者搞出来的。有网友就说这个逻辑如果用在生孩子上，就是你老婆怀孕不是你搞出来的，是妇产科的大夫

检查出来的。他的逻辑是混乱的。本来你生了虫子，最后变成啄木鸟的问题，你不啄的话，我好好的很健康，拿个袍子把所有肮脏的东西遮起来，我是太平盛世，其实已经腐烂的很严重，大家为了你健康和安全，说你身体里已经有很多问题了，赶紧预警，马上去治疗，治疗好了你就健康了，为了保障你的健康。他说我好好的，你看我的袍子多新鲜，多绚丽，多美，多伟大，把这个记者给幸了。

很遗憾，当年的山西疫苗事件之后，媒体曾经采访过我，我曾经说如果山西疫苗事件不了了之，山西疫苗事件这样的恶果在数年之后在中国再度出现可能更加严重，不幸被我言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预言。报道是3月17号发表的，5月12号《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被免职，当时上级主管单位领导说跟最近什么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不断强调，强调了好几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这个事件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做了三次批示，比今年山东批示密度高，但是事情最后依然不了了之。有关部门的信任危机更加严重，孩子和公众安全更加危险。所以必须要反思疫苗的监管。对过失者的纵容，就是对法律违心的亵渎，对人本价值的颠覆。专门研究风险社会的德国科学家贝克认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关于疫苗意见监管问题，陈涛安会专门讲，我在新闻专业角度再说几句话。今年山东疫苗报道之后，媒体舆论出现一个密谋，不是问责造成问题的人，而是问责说出问题的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今年舆情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南方都市报》有一个记者做了一个《疫苗之殇》的片和报道，有一些大V说“殇”这个字不合适，在字上追究记者的问题，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才叫“殇”，与疫苗有关联造成的伤害和死亡不能叫“殇”。并且被很多人追捧。这正中监管者和政府下怀，人民搞人民，群众斗群众，好开心我觉得很糟糕。

关于新闻，新闻业的职责是四点：第一，告知；第二，预警；第三，启迪；第四，监督。这是真正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告知就是最大限度实现公众知情权，公众之所以恐慌，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传播信息，而是因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准确、信息不真实，大量信息政府控制，不给公众透露。一个人判断力源于其掌握信息资料的多寡，掌握信息越多，人越理性，掌握信息单一，人就会进入偏执和恐慌。所以真相可以消除恐惧，媒体作用恰恰是通过独立深入的调查，传达出不可或缺的信息，尽可能的逼近真相，但是真相却往往被遮蔽。第二，新闻业的职责在于预警，起到瞭望者的作用。第三，启迪，我不展开讲。第四，监督。媒体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是现代新闻业一个基本概念，是指媒介代表公众行使对于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违法犯罪行为之监督，代行的是公众的反对权和监督权，手握的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这是舆论监督。刚才说媒体代行，给人感觉是一种契约关系，实际不是契约关系，是长期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人们天然认为媒体受公众之委托，代行公众的监督权利。媒体不能行使监督的时候，媒体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媒体，那叫做喉舌和口条，猪嘴里有口条，专为猪说话。媒体是监督者，这一点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

第二是专业的真谛，很多人讨论新闻专业主义，专业是什么？新闻的灵魂是真实，无论在任何社会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对如何实现真实，大家的认知又有所不同。其实新闻核心工作是查证和核实，不是新闻联播把某人说的话传播一遍，那不是新闻，那是传播，那是宣传。山西疫苗报道实际上是调查性报道工作，所谓调查性报道工作就是寻找证据的工作，查事实的工作。当时好多人说你们这样一个媒体为什么可以挑战山西、挑战卫生部、挑战新华社，最后能够安然无恙？靠证据。大家可能有在公安局做过询问笔录，或者检察院做过调查，大家看，我对重要的事实，重要的信息和重要问题，要求被调查人和被采访对象以调查笔录方式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几几年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地点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谁家，调查人基本信息，被调查人身份，调查主题，以下是被调查人口述，他说什么我记录什么，最后让他看，看了以后，以上记录样我所说一样，签字画押，按手印。所以李书凯看了这个以后，包括山西省委宣传部一千人看了个就傻了，我是证据累起来的报道。所以骂一个人是流氓不是本事，证明一个人是流氓才是本事。情绪没有任何力量，有力量的是事实和证据。就是把大量事实和证据拿出来，不要有任何情绪，搜集事实，按照严谨的逻辑呈现出来就足已。

有关高温疫苗，我在山西搜集大量实物，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山西卫生厅说是来自卫生部大型专业公司，很简单，我到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一查，三人合伙私人企业，注册资本 50 万，注册当年 7 月份，正式和山西方面拍拖的时候，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发了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抽逃注册资金，罚款 5 万，要求他补足注册资金。就是这样一个公司居然垄断山西全境疫苗三、四年，更糟糕的是经营范围没有“疫苗”两个字，好扯淡。山西卫生厅、山西疾控中心，大家睁着眼睛说瞎话。谁在破坏社会的信用体系，谁在拿百姓生命不当回事？不就是看到了疫苗背后的暴利吗？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说我胆子很大，实际上我胆子很小。很多人说我是调查记者，多勇敢，外科大夫一样，外科大夫做的越多越小心，做报道越做越害怕，因为我手下送进监狱 160 多个人，每个人都在想着你，很危险的。保证安全的是什么？每个细节谨谨慎慎，不敢有半点马虎。我做几十年记者，送进监狱很多人，拉下马的很多人，我自己至少在新闻专业这块安然无恙，他们没有办法把我送上被告席，为什么？非常严谨。我的原标题是“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但是各个网站专发的标题较是“近百孩子接种疫苗致死致残”，这跟我的报道差距很大。我为什么没有说近百孩子接种疫苗致死致残？因为接种疫苗致死致残是医学结论，我不是搞医学的，我怎么会这样说。我调查的 78 个案例里面，有 3 个案例直指疫苗，并且可以说就是疫苗把孩子致残的，但是一份法院判决书说这个孩子是疫苗接种导致致残，两份地级市疾控中心证明是接种疫苗致残，这是我调查 78 个案例当中 3 个案例与疫苗直接有关，其他的我无从证明他们与疫苗直接关系，但绝不否认他们和疫苗是关联因素。我们作为公民有质疑的权利，这么多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一系列情况，与疫苗有关联，这一点我们绝不讳言。所以好多家长跑了 N 多医院，包括检验机构，把所有导致孩子病症和体征因素排除出去了，最后难以找到致病原因，只能说是不明病因致死，这是比较客观的陈述。有人说王克勤写的这么多孩子与疫苗有关的致死致残，

与山西境内大量疫苗高温曝露，你这个是因果关系，我说没有，我说这陈述，就是这么多孩子与疫苗有关联、致死、致残的同时，同一个时间段，山西境内疫苗监管出现“标签疫苗”和高温疫苗，是关联。一定要严谨。曾经有很多案例，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缺某些要素进一步求证，对方给我调查的时候说的话模棱两可，就割肉。用最有力的，最准确的、最可靠的信息做靠谱的报道和靠谱的研究，这实际上是一个研究成果。所以我一直厚道做人，厚道做新闻，知道一就是一，知道二就是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就没有，任何时候都不怕。我有一个记者写“地震灾区农户户户受损”，我说地震灾区那么多农户，哪来的户户受损？你所有都调查了吗？他说我在村子里面采访 6 户人家，说句实在话，在当下如此浮躁的时代，一个记者能在一个村子里面采访六个农户已经是好样的，但是我把他骂的狗血喷头，但是你是我带的兵，我要严格要求。我说你不能这样说，这个话哪来的？ he 说是村支书说的，我说那就要写“村支书：户户受损”，要有信源，公众才会对媒体保持尊重，你把信源呈现给大家，这是你的工作。还有记者说据记者说“调查该地土地里二氧化氮含量是 21.6%”，我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采样的？结果在哪里？说当地一个砖厂检验报告里面说的。我说你就应该说几几年几月几日某某砖厂提供的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说：“土壤的二氧化氮含量是 21.6%”。要严谨，不能为了好读而丧失真实和准确，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人应该做的。就像当时为了做的准确，我专门买了《变态反应病学》、《病毒学》，我读这些书，不是想当专家，就让自己的新闻报道少犯常识性错误。一定要认真严谨，严谨就是对事实的忠诚。

陈涛安：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是一个卫生行业的体制内人员，现在依然是体制内人员，是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所以说疫苗的问题是说我们的家丑，说卫生行业的家丑。我这么多年来能够自曝家丑，为的目标是老百姓的安全、孩子们的安全和社会的进步。所以，你不曝出家丑来就进步不了，就是这个原因。

我把我自己先做一些个人介绍，我以前是军人出身，在部队上当过侦查连连长。当连长以后，突然有一天想上大学了，我就申请转业，从部队转业回来，87 年 27 岁，考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又上了大学，变成大学生了。大学我学的是生物工程系医用软件专业。学完了以后就回到卫生行业，成为山西省卫生防疫站的重要骨干，国家很多课题和项目我有的是参加，有的是主持，完成了好多科研项目。其中有一项目就是主持中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究的疫苗用量很大，如果手工表布卡管理是管理不过来，希望用计算机把疫苗管起来。当时我领受国家的任务开发出来全国使用的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这样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以前是人为的进行操作，现在是程序管理，把秩序和制度全放在程序里头，工作环节上再没有情面、没有疏漏。当时 96 年，卫生部下文件全国推

广这个系统，这样去管理疫苗，保证很长阶段预防接种的秩序是很好的。正因为由我开发研究这个软件系统，所以和疫苗结缘，对疫苗的法规、制度、特点都比较清楚。

今天我与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疫苗安全与监管制度。以前我们说卫生防疫站，后来转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全额的事业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后，也被一些市场的铜臭味感染，这个时候市场的因素也导致，我们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蠢蠢欲动想挣钱了。其实市场是好事，促进竞争，但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全额事业单位是人民服务的，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允许他也进入市场做买卖就不好了。

我们国家在 2005 年颁布了一个疫苗条例。疫苗条例把以前的疫苗由疾控垄断的，政府买办的方式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方式开展，按说从社会进步上是个好事。但是，他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我们的疫苗的使用流通出现了一大堆乱象，山西疫苗事件出现问题只是一个表现，其实是全国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今天山东疫苗事件出现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不只是山东没管好疫苗出了事，应该是全国都没管好疫苗，只是出了一个山东的案例而已。我们现在疫苗问题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疫苗流通制度与冷链。疫苗生产环节是比较好管的，生产企业数量少、规模也较大、条件好会主动按照生产标准、生产规矩去自查自纠，也易于监督管理，所以很容易能够抓好。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之一就是疫苗的储存运输，流通过程中的问题。疫苗怕光、怕热，也怕冷，冻着也不行，热着也不行，所以温度要有上限、下限，不同疫苗温度要求不一样。

疫苗本身应该是冷藏的，按照一定储存环境保存，要是脱离这个环境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疫苗的效能要下降，如果脱离了环境，预示着疫苗效力就要下降，可能变成了降效疫苗了。再往下再严重的脱离环境，这个疫苗就失效了。失效也好，降效也好，疫苗的效力没有以后，疫苗还剩下特点就是负反应，它失效了不会变成白开水，负反应还在。降效了，失效了，负反应还在，甚至负反应会加强。就是失效以后，疫苗这东西变质了，变质以后就会产生严重的负反应，就会使不良反应的概率就会增加。所以疫苗是脆弱的东西，在我们管理过程中，国家下了很大力气建设冷链，从省、市、县疾控中心，一直到乡村，都要整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冷链体系，保障疫苗的安全。

2005 年，疫苗市场放开以后，国家的冷链体系只能走一类疫苗，二类疫苗经营和配送跑到市场上去了，由疫苗批发企业来配送。假如说你打疫苗出事了，出事以后谁赔呢？一类疫苗政府赔，二类疫苗生产企业赔。

二类疫苗的储存运输这个过程，冷链的成本很高的，批发公司暗自把冷链搞坏了，老百姓出了事，由是企业赔。这样的话，就是批发公司只挣钱不用赔钱，他们为了扩大他的利益，就会暗自在冷链上就会偷工减料，能挣更多的钱。条例规定批发企业搞二类疫苗的冷链储存、运输，是这十年来的一个制度大漏洞。

正因为预防接种工作一直在这个漏洞下运行。才会出现山东疫苗事件的“庞氏母女”，疫苗批发企业招募大量业务员，暗自把疫苗存在家中做买卖，出了事情是企业赔，存储、运输过程中暗自脱离冷链，不冷藏了挣钱更多，当然有良心的人不会这样做，没有良心的人才这样做。山西疫苗事件也是这样的，出事了厂家赔，他们就把数百万人份疫苗搬到大楼里面贴标签去了，垄断地卖高温暴露疫苗，贴签疫苗。这就是黑心商家不顾老百姓生命安全干的事情。

山西疫苗事件比山东疫苗事件更恶劣在哪呢？就是官员有组织地参与进去了，还下了很多行政文件，山东疫苗事件没有行政文件，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山西疫苗事件情节比山东更恶劣。山东疫苗事件波及较广，24个省都出现了。

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样的漏洞呢？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国务院来了一个官方人士，让我给国家献一策，我也把这个策献给人家了，当然他究竟是不是国务院的我不知道， he 说是代表国务院来的。这一策提到，目前的监管制度所产生经营环境有问题，保证医疗安全的冷链质量与批发公司挣钱量是相反的，冷链越破坏，批发公司挣钱越多，批发公司有什么动力把冷链搞好呢？我个人认为疫苗、药品的冷链问题不是通过市场解决的，是通过政府公众安全保障解决问题的。所以，应该建立全国的冷链公共服务系统，建立这样一个服务系统以后，商家做买卖，你是拿钱互相买进卖出，你流通的疫苗、药品就在公共服务冷链系统中跑，只要脱离这个系统就要销毁。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冷链问题解决了，得力地管理起来了。

再一个，这个公共服务系统的服务，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比较合适，为什么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个机构，是全额事业单位，本来就承担着一类疫苗的配送服务，库存和运力都不饱和。这样，如果企业买卖疫苗，就走单子，不见货，货在公共服务冷链系统中跑，形成这样一种运行机制。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疫苗再不会脱离储存运输环境，一旦脱离就销毁了。第二，由于保留了二类疫苗的市场属性，买卖是在批发公司之间走，产生很好的竞争机制，刺激厂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服务，对于中国疫苗产品经济的发展有好处。第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疾控机构负责冷链公共服务，疫苗情报了如指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业务、技术支撑，哪个县、哪个地区到底有多少疫苗，他的软件系统就可以统计出来，一旦出现疫情，他可以立刻组织疫苗、调动疫苗来解决问题、应对危机。

这个地方我简单插一句，最近，咱们国家出台了新疫苗条理，对疫苗管理做了决定。这几天重庆正在闹三腺炎疫情，居然政府买不到疫苗了，疫苗供应断了，重庆三腺炎疫情现在是比较严重的，究竟能不能弄到疫苗，他还在求援。所以新疫苗条理中采取单纯政府包办，又出现了疫苗供应僵化、响应慢的问题。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式的话，成立冷链公共服务系统以后，买卖方式还存在，疾控机构掌握平台里面疫苗的数量和取向，什么地方有多少都清楚，一旦有疫情马上就调拨过去了，很快。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疫苗市场的放与收。疫苗市场在 2005 年以前是政府包办的，疫苗流通社会没有关系的。2005 年疫苗条例出来以后，二类疫苗放开了，由市场运行，市场运行有表现出了积极作用。2005 年到现在 10 年，我们国家二类疫苗产品蓬勃发展，走向了国外，出口了，成为世界产品了，这就是竞争的红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我们国家创汇、创收。但是放开市场，你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跟不上很粗放的话，就要出事。10 年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们来探究一下原因。

第一，既然走市场了，药监部门有权批准一个药品批发企业，是不是能够批发疫苗。由于这个行政许可搞得很粗放，药监部门核准一个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苗，就可以经营全国的二类疫苗。如果，这个疫苗批发企业很只有一个冷链车，一个冷库，他怎么经营全国？他往别的省运，往别的市运的时候就没有冷链条件了，没有冷链继续经营疫苗就要出现高温曝露了。在这个地方，在以前条例执行上一直是一个严重的漏洞。

第二，我们的监管问题，2005 年，一说疫苗开放了，药监部门急着搞行政许可，搞许可可以挣钱，我许可一个你给我交许可费、交评审费。在市场监管上不下力量，造成严重的不平衡。我们国家药监局是 1998 年成立的，设为国家、省、市、县四级，总共人数有 10 万之众，但是这次山东疫苗事件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那个司长讲，我们有检查监督资质的工作人员不足 500 人，你 18 年只为全国培养出 500 个检查监药品的人员，这是不是渎职？是不是失职？光顾着搞评审挣钱，顾不上对社会检查监督。山东两次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事件是我举报出来的，山东疫苗事件 2012 年一次，2016 年一次，都是警察抓住的，药监部门全国不足 500 人怎么能抓住问题疫苗？全国 3000 多个县，他 500 个人怎么分布？所以，这就是监管部门在机构划分、人力部署上出现严重漏洞。

第三，药监部门只管企业，不管搞经营的人。管企业可以收费，管个人只有麻烦没有好事。企业经营药品、疫苗的人，本应是专业人员，要有资质，但是药监部门没有管。可以说，昨天是卖白菜的人，今天就可以卖疫苗。我们做饭的厨师还分等级呢，但是搞疫苗生意的买卖人员竟然没有资质，18 年就这样过来了。山东疫苗事件出现的挂靠、走票等情况，跟这一漏洞有直接关系。

第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既是二类疫苗经营者，又是执法者，传染病防治法赋予他疫苗使用管理的权利，是行政权和执法权，疫苗条例又赋予经营权力。他有两个权力，这样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疫苗市场就是独占鳌头，成了疫苗市场秩序的害虫，谁也惹不起了。正因为这样，才出现山西疫苗事件，山西疫苗事件就是把左手有经营权和右手监管权卖了，一年收 380 万的权力租金。疾控机构有这两种权力，就会导致权力寻租，给社会和公众造成危害。最近还有一个兰菌净事件，是一高层疫苗寻租事件，兰菌净不是疫苗是药品，却假扮成疫苗，若干年了全国各地天天给老百姓打。

第五，疾控机构具有行政权和执法权，易逃避法律监督。他利用行政权和执法权为自己开道，利用经营权力获得利益，可以无法无天。山东疫苗事件是冷链车过来的，还是网上邮过来的二类疫苗，只要他挣钱做这个买卖，就造成端口失守。我以前是侦查连连长，我一直侦查一些事情。山东疫苗事

件中我安排了卧底，发现疾控机构和预防接种站还有倒卖空疫苗瓶问题。倒卖空疫苗瓶是什么意思？空疫苗瓶是制造假疫苗必要原料，没有空疫苗瓶做不出假疫苗，还有倒卖这个的现象存在。

最近国家决定修改疫苗条例，当时我和王老师想促成修改条例，真是费了很大力量也没有促成，这次山东疫苗事件，克强总理下定决心修改疫苗条例，先颁布了立即执行的一部分。他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药品批发企业不再经营疫苗，厂家直接对疾控机构，这似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把市场收回来了，不开放了。

这对于山东疫苗事件表现出的全国市场乱象，应急收一下是对的。但是如果收回来就不放了，就这样下去了，那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二类疫苗本身就是商品，在市场合理竞争优胜劣汰没有问题，是由于监管制度上有一大堆漏洞造成的乱象，不是市场造成的。第二，就像刚才视频中王宇说的咱们疫苗很落后。市场竞争可以刺激企业改进工艺，改进技术，使我们疫苗走向国际。但是现在如果收回来，二类疫苗都是政府包办了，定产定销了，吃大锅饭了，这时候竞争的红利就不存在了，咱们的疫苗生产技术又开始停滞不前，不会发展了。

疫苗条例定的是一个省一个采购方，采购疫苗是以省为单位向生产企业进行采购，这样生产企业不需要靠提高质量、提高服务、降低价格来公关老百姓，他是要公关什么？公关省级平台，省级平台同意买我的，我的疫苗就卖出去，这样我们中国疫苗产品经济能发展吗？肯定发展不了。所以咱们现行的疫苗制度，如果长期运行是有问题的。

疫苗条例定的是疫苗企业直接跟县疾控中心做买卖，就是你的公关目标 30 多个是省级平台，3000 多个县疾控机构。一个疫苗生产企业要派 3000 多个企业代表，分散到全国各地跟县疾控中心做买卖，生产企业派这么多人下去，产销不分离，最后这个企业还能发展吗？会被市场要拖死的。你生产的就是生产的，你批发给经销商就行了。生产企业每个县搞一个企业代表，这个肯定是受不了的，会加重生产企业负担，最后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疫苗价格上升。

这次条例调整以后，对于偏远地区，二类疫苗的供应肯定有问题，短了经营环节以后，刚性的买卖，供应不上了。这个孩子被狗咬了，找不到狂犬疫苗，要出事的。把村级预防接种点撤销了，全部在乡里面接种。作为乡村里的农民，他的预防保健意识是很弱的，村医不断宣传接种疫苗好处，他才能才会接种，如果都到乡里面，村里面农民接种自主觉悟不会那么高，这样中国预防接种率就会明显下降。预防接种率下降以后，就会出现传染病流行，将会带来灾难。

十年的二类疫苗市场放开，由于监管不到位，出现监管漏洞，出现一大堆问题，害怕了，又收。真的把市场收回来以后，就成为一个落后体制，落后体制还会出现一大堆问题，特别是行政代替市场，权力集中易产生腐败。

我认为解决二类疫苗收与放的问题，就应该市场的回市场，政府的回政府，要好好分割开。二类疫苗有商品属性，归市场经营、市场竞争。二类疫苗又有安全问题，归政府管理，由疾控中心承担，各归各的。

基本方法是，预防监督单位作为基本采购单位，批发企业不再运输二类疫苗了，疾控机构不再经营二类疫苗，是裁判员就不能是运动员。疾控机构在辖区内提供存储、运输公共服务，批发企业可以买疾控机构的服务配送疫苗，只能购服务不能自己储运。生产企业向批发企业销售疫苗，同时完成省际之间的疫苗配送，这样体系就相对比较合理。在这个方式下，我们再细化存储、运输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法规，对失职的、渎职的、违法的进行监管。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疫苗监管公信力问题。目前，老百姓没有信心，不去种疫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老百姓现在已经伤透了心，到街上问，十个有七个说政府管不好，公信力已经丧失的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是媒体造成的，媒体只是告诉你问题疫苗存在，不是媒体把疫苗弄坏了，老百姓盲目信任疫苗不是好事，质疑疫苗监管问题不是坏事，把问题解决了质疑就转化为信任了。

政府就要积极地补监管漏洞，最大的漏洞就是失信，山西疫苗事件的时候，你说不论什么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最后全部姑息了，但是老百姓可不姑息他，最后老百姓不信政府了。

山东疫苗事件我是派了卧底下去的，我在 2013 年就向国家卫计委写信，报告山东乃至全国二类疫苗流通有问题，广泛的出现了家庭囤积疫苗体外循环现象。当时祸害山西的北京华卫公司、卫生部部企业没有被处理，从山西跑出来，变身为北京华夏德众公司，换一个马甲跟河北一个公司合作，马不停蹄跑到山东跟庞氏母女做生意去了。

2012 年有一个山东潍坊的疫苗事件，跟今年山东疫苗事件相似，倒卖疫苗 1.2 亿，一折翻也是 2 点几亿了。这么大的一个案件只处理了 8 个业务员。如果说庞氏母女这个案件不被澎湃新闻揭露，能处理 10 个业务员就不错了，不会出现今天 357 个行政人员受到处分，300 条线索全部抓起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官方对疫苗的为非作歹者一般比较仁慈。

这么多疫苗事件以后，政府监管欠帐很多，应该把不了了之的疫苗事件和山东疫苗事件同时并案处理，惩前毖后绝不姑息。让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体会到政府确实想把疫苗抓好，如果依法处理出一个结果来，必然振奋老百姓的预防接种信心。

我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疫苗科室出租托管问题。这里我想讲一下隐藏在背后的隐患，很可能爆发。就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托管科室、出租疫苗管理科室的问题，最早王记者《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曝光了山西省疾控中心年 380 万，将科室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出卖给私营公司的问题。

2013 年底，我们向国家卫计委申请信息公开，“山西疫苗事件中省疾控中心一年 380 万的价格，将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出租给北京华卫时代私营公司的合法依据。”得到的答复是：“《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没有禁止疾控机构将生物制品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管理托管给第三方的规定。”看来，国家卫计委的答案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托管科室、出租疫苗管理科室不违法。

2014 年初，我们再次申请信息公开，指出疾控中心的法律职责和权利不能买卖，疾控机构在疫苗使用管理中是执法者，应遵守凡是法律未赋予其权力的，都是禁止的。要求国家卫计委更正此信息公开内容。但得到的结果是，私营公司不能打卫生部的旗号，不能用卫生部的名义，购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疫苗管理科室。

我给各位专家的资料附件就是国家卫计委信息公开告知函，白纸黑字盖着公章，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间那一页我画了黑线。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国家高级机关都认为出卖科室是合法的。私营老板就可以买，买了以后就可以下文件，可以发号施令了，这个科室看似国家的一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一个老板利用公权牟利的工具。这次山东疫苗事件我们也发现河北的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一手是国家的科室，再反过来就成为私人公司了。如果，国家卫计委允许这样，这就是一个等待爆发的重大隐患。现在实行省级二类疫苗公共交易平台，一个省一个二类疫苗购买方，如果省疾控出租出卖了交易平台的权利，我认为后果不堪设想？

我讲的第五个问题是预防接种不良反应问题。接种疫苗都有负反应，概率极低，百万分之一二。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摊上这个事就是摊上大事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清楚一些概念，一是，接种合格疫苗永远利大于弊，接种问题疫苗永远弊大于利。每个人应按照预防接种程序和需要，积极地接种合格疫苗。二是，接种合格疫苗 99% 是为社会做贡献，1% 是为自己服务。为什么？疫苗最根本职责是防止传染病流行，每个人都接种疫苗以后，传染病就失去了流行环境，我接种疫苗同时在他贡献，这是一个社会工程，个人接种疫苗都是社会做贡献。对于预防接种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国家只给补偿，不给保障，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在救助、补偿、赔偿制度上改正问题不断完善。

首先，国家应及时制定《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救助办法》，建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救助长效机制。使接种不良反应者早救治、早康复，降低身体损害程度，使其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形成多部门关爱救助的良好氛围，提高老百姓的预防接种信心。

第二，救助办法中应设定条款，接种疫苗多少天内出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事故，先由国家救治再鉴定、补偿，对于一些特别严重家庭可进行终身扶助。

第三，应在《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事故要端口前移，向社会开通接种疫苗异常情况报告信息通道，受种者可以使用手机、互联网等渠道，向卫生管理部门报告自身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情况。有效杜绝基层接种机构漏报、瞒报现象。

第四，应修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第十一条，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成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负责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预防接种服务

活动，再指定其负责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会存在自己调查自己的自证其罪情况。可改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成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负责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

第六，预防接种是面向健康人群服务，而医疗是面向患者服务，二者的事故存在诸多差异，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具体的《预防接种事故处理细则和鉴定办法》。

第七，加强对医学会组织鉴定工作的监督，特别是对受理、中止、终止等问题的合理性监督。保证专家鉴定的公平、公正，严惩违反回避原则参加鉴定的专家。

第八，建立国家预防接种不良反应鉴定专家数据库，随机抽取鉴定专家，开展远程视频鉴定等。疫苗不良反应与事故的当事人，可委托专业代理人，参加鉴定前官方调查诊断取证工作等。

在这里今天来了一个家长叫赵国平，他是接种了山西的高温疫苗、贴标签疫苗、问题疫苗之后出现了情况，当时他不知道，是王老师报道出来以后，他看到报道以后找到当地行政部门，这时候他就拉开了维权的序幕。当时太原市疾控机构给他做了一个鉴定，说你不是高温疫苗导致的，是你小孩先抽风，已经得病了，病时打针的，跟疫苗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的疫苗接种规范写的明确，抽风的时候是不能接种疫苗的，这是违反禁忌证的。正因为如此，他通过当地卫生局申请医学会鉴定，这个申请很费劲，人家不给他鉴定，最后跑了好几个月，最后，让他鉴定交钱了，交 2500 块钱。交 2500 块钱以后，忙了一个月鉴定准备，人家一个月以后说你的鉴定中止，不给你鉴定。为什么？人家说你的病历都有，但是没有挂号本了。挂号本的内容病历里都有呀，就这样开始不断找，找卫生局、市政府、卫生厅、省政府、卫生部、国务院、到残联、去人大、求药监、检察院和纪委，信访、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举报、报案 200 余次穷尽了一切行政途径，告到法院不予立案，累计跑路 10 万余里，数次被截访、被拘留，至今五年缴纳了 2500 元鉴定费没有举行鉴定。

去年咱们国家民告官实行了立案登记制了，赵国平似乎有了机会。这一年，他起诉太原市医学会收钱不鉴定被驳回；起诉太原市疾控中心调查诊断结论反科学和信息不公开败诉；起诉山西省卫计委、疾控中心官商勾结炮制高温暴露贴签疫苗女儿被害被驳回；省高院上诉再被驳回。

目前，这个家庭已经是一贫如洗，只有一大堆与官方往来的资料。乡亲们问，国平告的咋样？他说，在法院人家派了一群大律师对付我一个农民，都败诉了，一点钱也没了，跑不动了，眼前有理也无力诉了。

这次山东疫苗事件公布了 300 名涉案人名单，其中有一人叫张俊书，他是我的同事，2007 年，他与我共同揭露、举报山西疫苗事件，那时他的工资被停了，一停就是八年，去年才恢复了工资。王老师也采访过，是挺刚强的同志。2013 年他卧底山东疫苗“庞氏母女”qq 群中，为我提供了重要信息，我致信国家卫计委反映发现家庭囤积疫苗贩卖链，有他的贡献。官方内部资料称，他山东疫苗事件涉案 37.9 万元，是不是事实我不清楚，希望他没事。

王老师说，很多举报人下场悲惨，归结我是红二代至今没事。说实在的，我宁愿坐几年牢换回几年疫苗监管好制度。我是红军后代，也是平民百姓，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工资奖金各方面确实不少，是高工资、高待遇。目前，我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干什么工作呢？处理医用垃圾，是垃圾处理工，可能是中国职称最高的，教授级的垃圾处理工。

朋友们说，老陈，你有知识、有技术，不愁换个单位，何必在这里置气？我说疾控行业是保证疫苗安全的最前线，要当作阵地严防死守不能撤退，我这辈子哪也不去，给娃娃们站岗了。

我汇报完了，谢谢大家。 🍷

[【返回目录】](#)

张曙光 张弛：经济增长稳中趋缓 贸易战端影响显现——2018 年第 2 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张弛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上半年中国 GDP 增长 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CPI 上涨 2%，呈现出稳中趋缓的态势。房地产调控再度加码，进入了摇号分配房源的时代；“蓝天保卫战”如火如荼，环境督查成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有损于中国消费者和有利垄断者的影响十分明显，其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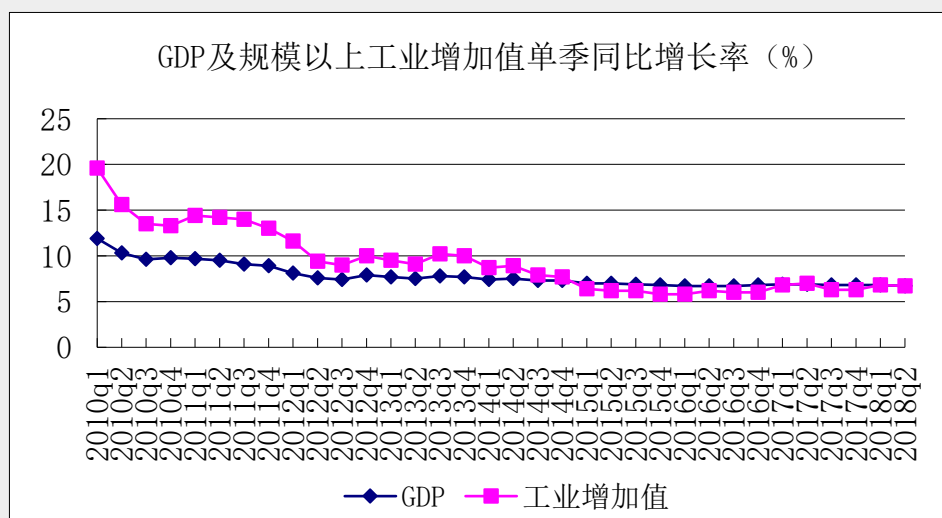
一、总量态势

1. 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平稳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在 6.7%-6.9% 的区间。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22087 亿元，同比增长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169299 亿元，增长 6.1%；第三产业增加值 227576 亿元，增长 7.6%。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6%，集体企业下降 1.9%，股份制企业增长 6.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6.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制造业增长 6.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5%。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1.6% 和 9.2%，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4.9 和 2.5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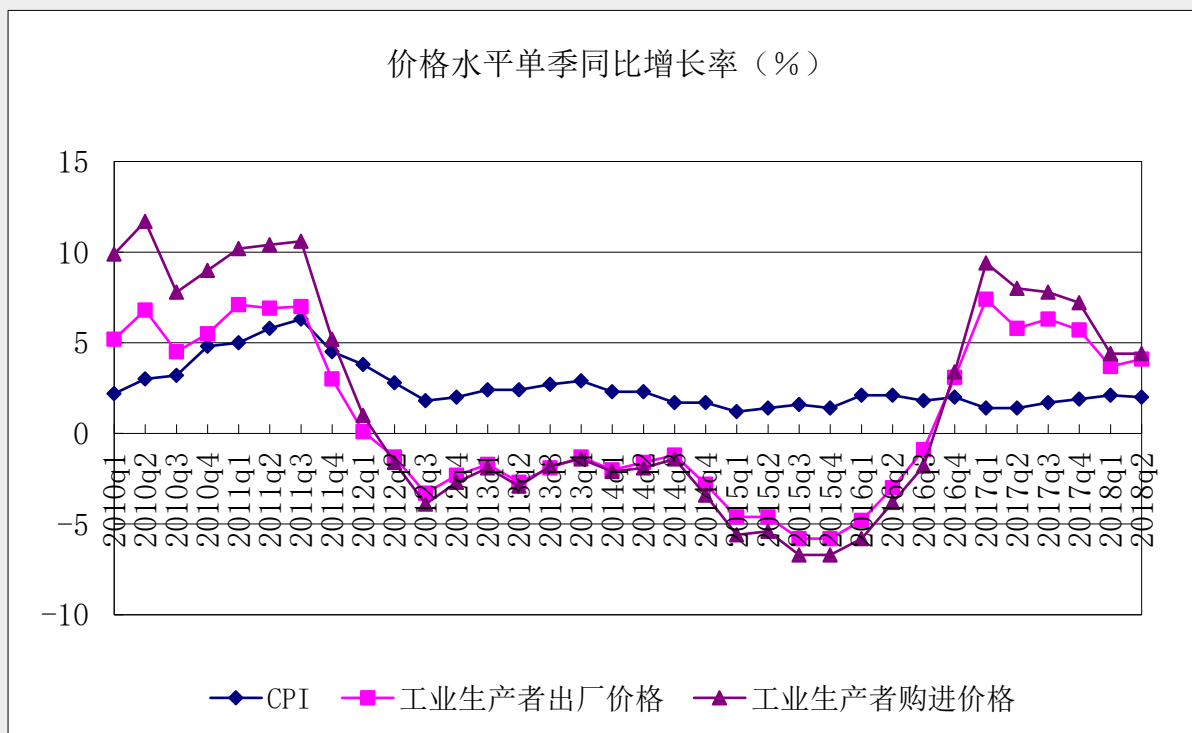
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



2. 居民消费和生产者价格保持稳定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4%，衣着上涨 1.1%，居住上涨 2.3%，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1.6%，交通和通信上涨 1.2%，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2.1%，医疗保健上涨 5.5%，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1.1%。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9%，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4%。



3. 劳动力市场就业率提升

前 6 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 4.8%–5.1% 区间，各月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6 月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超过 4.3 亿人，比上年末增加 500 万人以上。6 月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同比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

4. 人民币汇率走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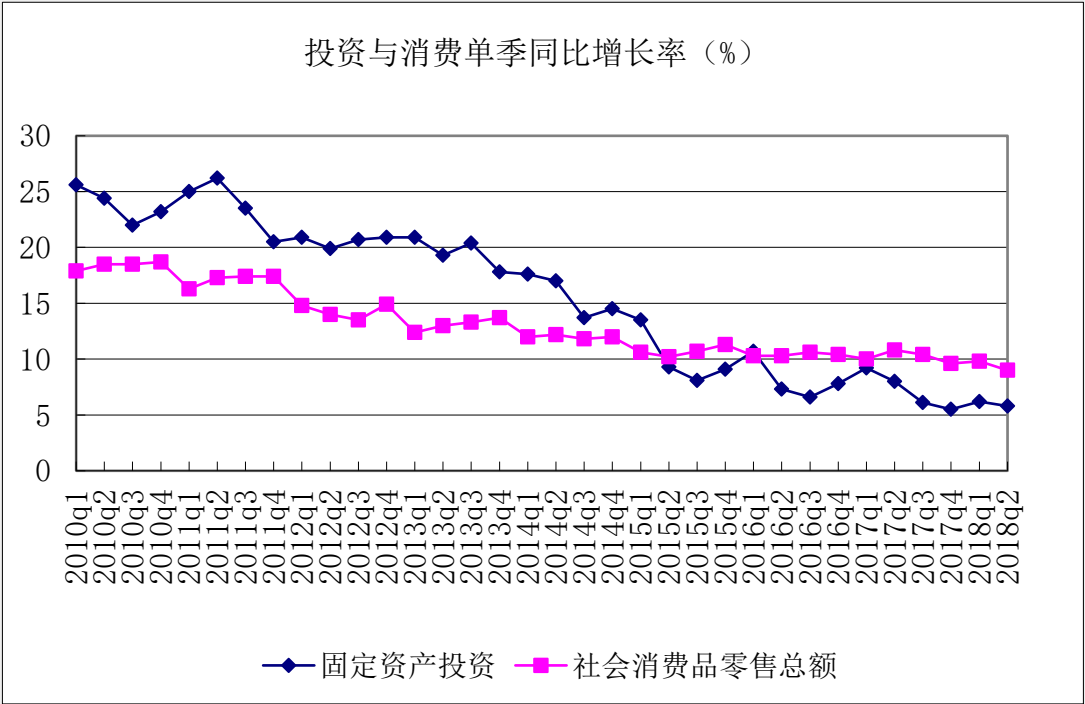
6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3.11 万亿美元。6 月末，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兑 6.6166 元人民币，比 3 月末贬值 5%。

二、因素与结构

1. 固定资产投资回落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7316 亿元，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1.5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 184539 亿元，同比增长 8.4%，比上年同期加快 1.2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3.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3.8%，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6.8%，增速连续三个月回升，比一季度加快 3.0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6.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7.3%。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3.1%，增速比全部投资快 7.1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5531 亿元，同比增长 9.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77143 万平方米，增长 3.3%。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66945 亿元，增长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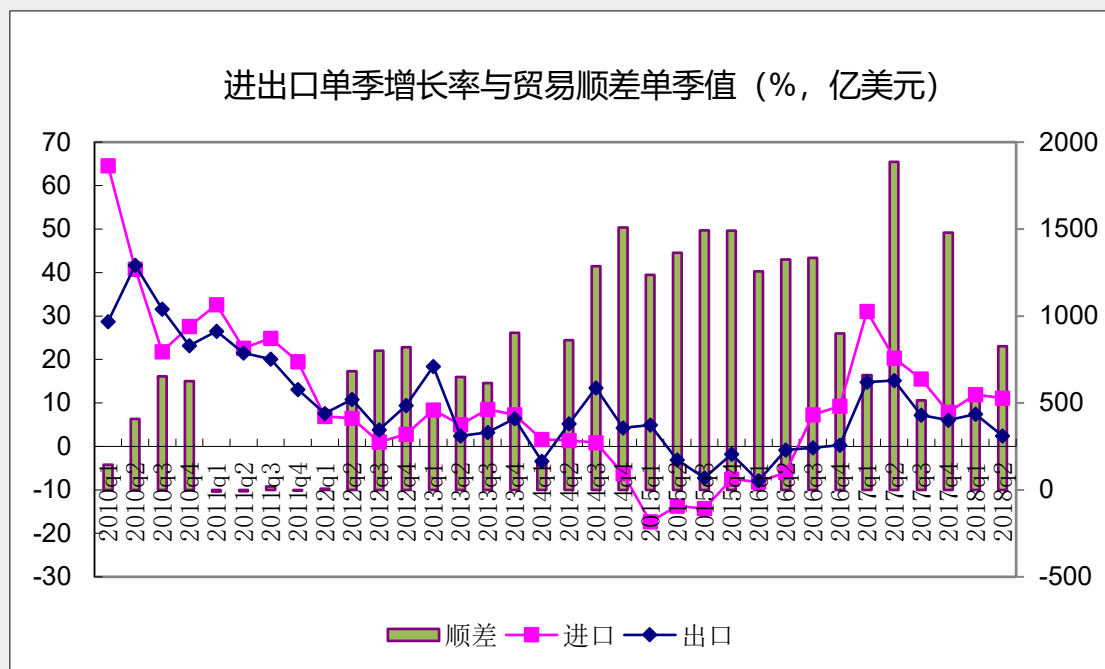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 元，同比名义增长 8.8%，比一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加快 1.3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6.8%，加快 1.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12.2%，加快 1.2 个百分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0018 亿元，同比增长 9.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

2、出口剧烈下滑 吸收外资增长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141227 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出口 75120 亿元，增长 4.9%，比 1 季度回落 2.5 个百分点；进口 66107 亿元，增长 11.5%，与 1 季度基本持平。进出口相抵，顺差 9013 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 26.7%。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12.2%，占进出口总额的 59%，比上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7%，占出口总额的 58.6%。对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我国对欧盟、美国和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5.3%、5.2%和 11%，三者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 41%。同期，我国对中东欧 16 国进出口增长 14.7%，高出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 6.8 个百分点。

1-6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9591 家,同比增长 96.6%,实际使用外资 4462.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折合成美元是 68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17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57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



3. 税收和非税收入一增一降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

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4331 亿元,同比增长 10.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890 亿元,同比增长 1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4441 亿元,同比增长 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91629 亿元,同比增长 14.4%;非税收入 12702 亿元,同比下降 10.8%。

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1592 亿元,同比增长 7.8%,为年初预算的 53.2%,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5371 亿元,同比增长 8.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6221 亿元,同比增长 7.8%。

1-6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1237 亿元,同比增长 3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22 亿元,同比下降 1.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9315 亿元,同比增长 39.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6941 亿元,同比增长 43%。

1-6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8130 亿元,同比增长 37.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808 亿元,同比下降 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7322 元,同比增长 39.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24864 亿元,同比增长 43%。

4. 货币供应量相对稳定 贷款余额快速增长

6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 177.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3 个和 1.1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M1)余额 54.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增速比上月末高 0.6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 8.4 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9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3.9%。上半年净回笼现金 1056 亿元。

6月末, 本外币贷款余额 134.81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129.1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2.7%, 增速比上月末高 0.1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 0.2 个百分点。6月末, 外币贷款余额 854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7%。上半年外币贷款增加 170 亿美元, 同比少增 299 亿美元。

6月末, 本外币存款余额 178.3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173.1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8.4%,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5 个和 0.8 个百分点。6月末, 外币存款余额 7892 亿美元, 同比下降 0.5%。上半年外币存款减少 18 亿美元, 同比多减 819 亿美元。

5. 货币市场成交量攀升 市场利率月环比微升

上半年, 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 445.32 万亿元, 日均成交 3.62 万亿元, 日均成交比上年同期增长 24%。其中, 同业拆借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56.1%, 现券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7.6%, 质押式回购日均成交同比增长 21%。

6 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73%, 比上月高 0.01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 0.21 个百分点; 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 2.89%, 比上月高 0.07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 0.14 个百分点。

6. 上证指数跌破三千点 下半年趋势未可乐观

上半年 A 股整体呈下跌走势。上证指数由 1 月底的 3587 点一路下跌至 7 月初的 2691 点, 跌幅达到 25%。从基本面看, A 股面临的国内外宏观形势及资金面都不好, 内部是去杠杆进行攻坚阶段, 资金链收缩。上半年有超过 200 家 P2P 平台“爆雷”, 不断有地方融资平台打破刚性兑付, 大量中小企业被质押股票被强制平仓。外部是中美贸易战和人民币大幅贬值。从技术面看, 上证指数跌破 60 月线, 市盈率已降至大约 14 倍, 已经接近历史最底部区域。但是考虑到紧缩的金融环境以及美国股市面临巨大的资产泡沫风险, 下半年 A 股走势仍难乐观。



三、政策效应

1、宏观总体观察

今年上半年，GDP 增长 6.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CPI 上涨 2%，2 季度比 1 季度均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保持了稳中趋缓的增长态势。在国内外“异常复杂严峻”的环境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实绩，确属不易。

在上半年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9.4%，比 1 季度增长（9.8%）有所回落，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8.5%，比 1 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14.2 个百分点，一方面反映了稳定消费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消费的低迷也值得关注。服务业增长 8.0%，比 1 季度增长（8.1%）也有趋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 60.5%，比 1 季度减少 1.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仍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过，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值得关注。金融业出现了过度发展，且存在着自我循环，没有做到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医疗、教育、养老服务仍然是发展中的短板，急待扩大供给能力，提升服务水平，一些传统服务业，如商业零售、旅游观光等受到互联网和新业态的冲击，仍处于艰难的调整和转型过程之中。

与消费的相对稳定相比，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持续回落比较明显。上半年增长 6%，比 1 季度增长（7.5%）回落 1.5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长（8.6%）回落 2.6 个百分点，已经从以往大大高于而变得低于 GDP 增长。而且，现有增长是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9.7%的情况下达到的。虽然制造业投资增长 6.8%，比 1 季度提高了 3 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可见，其他方面投资的回落还要更多。这一方面说明增长从投资拉动到消费带动的转换，另一方面，投资的过大和过快回落对经济的稳定也有不利影响。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影下，上半年进出口增长 7.9%，虽比 1 季度回落 1.5 个百分点，还是不错的成绩。不过，进口增长（11.5%）与 1 季度（11.7%）基本持平，而出口增长 4.9%，比 1 季度回落 2.5 个百分点，使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收窄了 26.7%。不过，出口回落过大值得关注，因为这一趋势有可能持续和加剧。

就业乃发展之基，民生之本。上半年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 1 季度的 5.0-5.1%，下降到 5.0%以下，5、6 月均为 4.8%，31 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也从上个季度的 4.8-4.9%下降到 4.7%，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也稍有增加。最近，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 17 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对就业工作提出了十条政策意见，体现了宏观政策就业优先的精神，还特别强调了支持返乡下乡创业，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不过，有人提出要搞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认为，就业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的个人自主的职业选择，不是搞政治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山下乡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一代人，其后遗症自今仍未消除，可能还会持续，千万别听这些瘦主意。与此密切相关，上半年新设市场主体 998.3 万户，新设企业 327.4

万户，同比增长均为 12.5%。这就为就业的增长提供了岗位保障。

从经济效益看，三大收入均有不错的增长，但增长结构失衡也很明显。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6%，与第 1 季度持平，但慢于 GDP 的增长，而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6%，税收收入增长 15.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6.5%，央企利润增长 23%，均大大快于居民收入和 GDP 的增长。看来，减税的步子还可大一些，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2、房地产调控进入摇号时代

政府调控一直房地产业运行的主调，自 2016 年 9.30 政策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五轮调控升级期。“五一”前后，住建部就房地产调控问题密集约谈 12 个城市，把房地产调控提高到政治站位的高度，并在 5 月 19 日发布长文通知，提出进一步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的六大举措，各地纷纷贯彻落实。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超过 180 次，累计 73 个城市进行调控，出台了 135 条限购政策，176 条限贷政策，51 个城市和海南省全域实行限售。其中限售 5 年成为房价上涨过快城市的标配。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州、西安等 7 个城市发布了房源统一摇号的政策，一些城市限制单位参与摇号。房地产调控进入了摇号分配房源的时代。6 月底，住建部、中宣部等七部委联合宣布，自 7 月初到 12 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 个城市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要求各地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监管主体责任，把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作为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 6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 61 个，与上月持平，下跌的有 9 个，比上月多一个。一线城市新房止跌持平，二手房微涨，31 个二线城市分别上涨 6.3%和 4.6%，35 个三线城市分别上涨 6.0%和 4.3%。看来，房地产调控将会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全面铺开。

首先，看看一些新的调控措施和原有措施的新内容。在本轮调控中，限购城市不断增加，以至催生了摇号制度的诞生，一些城市将限购从自然人调整为家庭，对离异家庭购房也作了限定。摇号制度表面看比较公平，但却放大了供不应求和房价利差的社会影响，进而出现了种种乱象。一、二手房价倒挂产生的房价利差吸引了大量购房者，有资格的购房者变成投机者，放大了需求，加剧了供不应求。至于摇号中的违规操作也不少见，造成了人为的恐慌。有人认为，住建部的约谈，意味着房地产调控从过去的一城一策开始升级到预警、约谈、问责三步走，但是，自从国家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来，似乎没有一起足以警示和震慑地方政府的问责案例发生，地方政府在博弈中不断试探着突破中央政府的底线。住建部 6 条举措的新内容是首次提出增加共有产权住房用地和控制租金指标，以前，大多城市共有产权住房用地采取划拨方式，包括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商品房等，新办法意味着这类房源的用地将通过土地市场的招拍挂来供应，或效仿北京在商品住房用地中“搭配”共有产权住房。而“控租金”如何控，控多少，又成了新问题。普通居民手中的二手房，租金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无法控制，而能够控

制的也许就是国有企业和大型中介所掌握的租赁房源。总之，新老举措的调控思路未变，仍然基本依赖行政措施，这不仅无法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且无法消除房地产市场的乱象。

虽然住建部给出的信息是楼市调控不会放松，谁也不能突破政策。但是合法非法突破的路径很多。就以最近人才大战的升级来看，50 多个城市参加到“抢人”的行列之中，采取的办法都是给户籍、给住房、给补贴。因而房地产限购关上了房地产投资的大门，而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又打开了购房的一扇窗户。你能说这样的突破不合法、不合理？

其次，房地产调控难以奏效是由于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土地市场高烧不断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集中反映了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下表是近 10 年土地出让金的情况。

年份	数量 (亿元)	增长率 (%)	年份	数量 (亿元)	增长率 (%)
2009	15910.2	63.4	2014	42940	4.1
2010	27000	69.7	2015	32547	-24.2
2011	33166	22.84	2016	37457	15.09
2012	28422	-14.3	2017	52000	38.83
2013	41250	45.13	2018 年 1-4 月	17958	40.7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2018 年 1-4 月，全国 50 个大中城市中，土地出让金收入最高的是杭州，达 1112.7 亿元，同比上涨 276%。由于大量房企进入三、四线城市拿地，推动热点城市土地销售创历史记录，全国土地出让金最高的 50 个城市，4 月单月的土地出让金 2842 亿元，同比上涨 83.4%。业内人士普遍用“城市土地出让金/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作为衡量地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指标。按此计算，2017 年杭州为 144%，南京为 136%，郑州为 106.7%，成都为 99.3%；今年 1 季度杭州也许更高。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一手低价从向农村集体征地，侵占农民的土地权利，一手向建设用地者供地，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政府采取招拍挂的方式有限供地，保持土地的卖方市场，以土地出让金来保证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和城市建设的资金平衡，形成了一种绑在土地上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模式。这是难以持续的。

再次，房地产发展背后的金融风险。在现行体制下，房地产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土地财政，而且发展了土地金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从政府方面看，由于城市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土地抵押融资，各地政府都成立了土地储备机构和政府性公司作为融资平台，一般情况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6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土地抵押融资占 60%以上；且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和土地储备的增多，城市范围的扩展和城市建设的加快，土地抵押融资的数量也会增加。前述那些土地财政

依赖程度高的城市，也是土地抵押融资占比大的城市。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也会随着开发商拿地向三、四线城市的扩展。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也就转化为全国的金融风险。二是开发商的融资和贷款。开发商的资金来源有销售回款、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销售回款取决于市场状况，股权融资的比例不大，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是重要渠道。由于金融去杠杆和防风险，大型房企还能从银行取得贷款和发行债券，中小房企很难从四大行取得贷款，只能寻找利率更高的商业银行，且融资成本差别很大。如万科6月29日发行了一笔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利率为4.25%，而荣盛发展于5月份发行的2018年第三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利率高达7.3%。目前，中小型房企的融资成本已高达12-15%，而大型房企基本上在8-10%之间。据海通证券统计，2016年为房企债务融资高峰期，该年共发行870只债券，总发行量高达8316亿元，且多为3+2、2+1年的还本付息期限结构，这就意味着2018年开始进入集中到期。一方面监管趋严，今年以来不少房企的公司债被中止，如合生创展31亿元私募债、富力地产60亿元私募债、碧桂园200亿元小公募、花样年50亿元私募、北京金融街投资有限价公司50亿元小公募。另一方面债务危机也浮出水面。据Wind的数据统计，2017年136家上市房企年报发现，平均负债率已达79.1%，为13年以来的高位，与此同时，发债成本也从上年的4-5%上升到5%甚至6%以上。像中弘股份、云房集团持股51%的京鹏地产，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不仅如此，由于国内市场收紧，不少房企借道海外融资，4月份海外融资折合人民币376.12亿元，比上月增加了将近1倍。据Wind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下半年，中国房企海外融资债券到期规模564.75亿元，明年1436.95亿元。4月19日，外管局公开表示，对房企举借外债持审慎态度，除有特殊规定外，不得借用外债。近日，发改委也发文严控房企外债。

3、蓝天保卫战和环境督察

这是本季度发生的重大事件。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确定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和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的三大战役，加快生态保护和修复，吹响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进军号。《意见》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明确界定，“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城乡区域统筹不够，新老环境问题交织，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突显，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

根据前不久生态环境部通报的《大气十条》实施情况终期考核结果，2017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细颗粒

物 (PM2.5)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39.6%、34.3%和 27.7%，北京的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58 微克/立方米。《大气十条》确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但，长三角改善的速度不及京津冀，且不够稳定，今年 1-5 月，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 10 个城市中就有徐州。京津冀仍是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该地区 5 省（市）优良天气比例仍不到 60%，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距达到 35 微克/立方米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珠三角作为一个重点区域整体达标，且连续三年低于 35 微克/立方米，2017 年又下降 15%，广州、深圳在全国一线城市中率先突围，广州为 35 微克/立方米，深圳为 28 微克/立方米。但汾渭平原因地理条件、人为因素和管理放松，发生反弹，PM2.5 排名后 20 的城市由 2015 年的 0 个增加到 6 个，从 2016 年底到 2017 年 1 月，山西临汾二氧化硫浓度持续攀高，实时监测指数多次破千（每立方米微克值），汾渭平原三省（河南、山西、陕西）只有陕西公布了 2017 年环境质量公报，PM2.5 平均为 57 微克/立方米，全省 13 个市区中，只有榆林达到年平均二级标准（35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和臭氧超标的市（区）超过一半。所以汾渭平原代替珠三角成为重点区域和主战场之一。

继 2017 年环境督查“回头看”，今年 6 月 7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2018-2019 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方案》，从 6 月 11 日开始到 2019 年 4 月 28 日结束，督查的重点区域是京津冀“2+26”城市、汾渭平原 11 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参与人数从 5600 人（次）增加到 1.8 万人（次）。为了加强环境污染防治和环境执法监察，生态环境部的预算支出比去年增加了 50.38 亿元，达 121.55 亿元，增长超七成，环境执法监察预算也从上年执行数 1.8 亿元增加到近 3 亿元，增长 163.52%。

7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针对我国当前结构性污染较为突出的问题，《行动计划》提出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如果要分轻重缓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是首要的。据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44.9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 60.4%，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仅占 20.8%。《行动计划》要求 2020 年煤炭消费降至 58%以下，电力用煤从 50%提高到 55%以上（美国占 90%以上，经济结构不同）。散煤治理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专家测算，去年冬季北京 PM2.5 浓度大幅降低，散煤治理的贡献率达 40%左右，京津冀“2+26”市和汾渭平原散煤消费约 6000 万吨，1 吨散煤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 1 吨电煤的 10-15 倍。《行动计划》要求在 2020 年采暖季前，在保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该两个重点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鉴于去年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推行大规模“煤改气”工程，由于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出现天然气供应不足，煤气管道铺设跟不上等情况，导致大批群众三九天受冻。《行动计划》指出，在技术路线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因地制宜选择采取多样化清洁能源取暖方式，不限于“煤改气”。“煤改气”也要坚持“以气定改”。

环境执法督查是必要的，成绩也是明显的，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决策更好，是负责任的表现。

但能否作进一步的思考和选择，则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

首先，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有之不觉，用之不察，失之难存，毁之难复。因此，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是一件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深入细致、常备不懈的大事，不仅要解决各级官员和广大群众的认识问题，而且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规则。就以官员的任期、考核和问责而论，生态环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把搞好生态环境变成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上级的要求。但是，现行的制度规则鼓励追求短期经济发展和任期内的政绩，地方主政领导和官员不支持甚至限制环境监管，把环境部门的监管行动看作是“破坏投资环境”。有的为了招商引资，把大企业当成“香饽饽”和“摇钱树”，对其环境要求也放得很宽，管得很松，一些企业也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放弃自己的环境责任，甚至在非法偷排上“打主意”、“下功夫”。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地方，甚至形成了大企业的排污特权。因此，如何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来修改完善我们的制度规则可能更为重要。

其次，环境督查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特别是在三年环境保卫战的过程中。但是，我们将其变成了最主要的行政手段和治理方式。国务院甚至全面启动大督查，涉及全部工作的六大方面。从国务院彰显和实施自己的督察权来看，的确是必要的。但督查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其效应是有局限性的，现在动员 1.8 万人，就是 18 万、180 万人，也还是少数。如何形成各种社会机构和团体以及广大群众的日常监督可能更为重要。因此，不仅要让各种民间机构自主建立和自由发展，而且要支持他们的正当活动。对此，笔者曾有亲身经验，1997 年，在时任国务院最高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下，南海大化肥要在三亚附近建厂上马，有关人士找到“自然之友”，请其出面设法阻止和纠正之事，它说“我只管得了金丝猴，管不了大化肥”，最后是一家 NGO 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把大化肥厂移址洋浦建厂。如果要真正形成社会监督和群众治理，除了宣传教育以外，实际行动可能更加重要，这些年发生了多起恶性环境事件，为了所谓维稳，我们往往掩盖为先，掩盖不住，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有几个官员被查处问责，有几个当事人被判刑，有几件环境事件大张旗鼓地处理和宣传，让全社会知晓、警示和反思？相反，有不少为此执言仗义、奔走呼号的记者和人士受到排斥、打击。最近网上报道，中国调查记者从 6 年前的 305 人减少到 175 人，并列举了 15 个记者因揭露社会问题而遭到打击报复的案例，其中与环境有关的案例有，《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 12 年，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本人被迫离职。至于像山西的疫苗事件，河南的艾滋病血液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都是如此，结果是危害继续蔓延和发展，甚至再次发生，最近的疫苗事件就是证明。就是“煤改气”事件，如果不从根本制度和行为方式上解决问题，还会发生别的类似事件。

四，体制分析

在第 1 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中，我们专门讨论了中美贸易摩擦，由于事态的发展，贸易战已经打响，

因而需要进一步讨论。

1. 贸易战的情况

在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美两国开始了贸易谈判。5月3和4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进行了第一轮磋商，5月15-19日，转场到华盛顿进一步磋商，并发表了不到400字的联合声明。中方牵头人刘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磋商“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最大的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加征关税。但事态的发展却走向了反面。

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对中美高科技领域贸易设限，是“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5月22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7月1日起，将汽车整车关税率先从25%、20%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关税率先从8%、10%、15%、20%、25%降至6%。

5月23日，商务部承诺落实中美联合声明，欢迎优质、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特朗普发表推文称，“我们与中方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展顺利，但最终我们不得不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架构，因为这太难实现，而且在达成协议后还难以核实结果”。

6月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华进行第三次磋商，提出一份一揽子计划。报纸只公开了其中关于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玉米、天然气、原油、煤炭和制成品。双方估计第一年的价值近700亿美元。知情人士说，在谈判中，刘鹤向罗斯明确表示，如果华盛顿继续推行其计划，向500亿美元的中国制成商品征收关税，那么，该提议将作废。外界估计，这一限制性条款有可能使得该协议无望达成。

6月15日，特朗普决定把3月份宣布的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的计划付诸实施，其中对约340亿美元的商品自7月6日起开征，同时对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中国立即予以反击，第二天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从7月6日起开征。

6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二是中国是国际贸易中一个负责任的伙伴，三是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7月6日，美国和中国开始对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正式打响。新华社记者称，这是“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寻求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豁免关税的企业将有90天的时间提交申请，批准后，豁免期为一年。中国在6日晚宣布，在世贸组织对美国追加起诉。

7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公布了一份公开征求意见的清单，涉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将征收10%的关税。这是全面贸易战的一个重大步骤。

2. 中兴事件始末

中兴事件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我们先对其做些梳理，然后分析。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中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零部件，期限为7年。此前该公司被指在关于它向伊朗销售设备的调查中作虚假陈述。与此同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警告英国电信供应商，使用中兴的设备和服 务将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4月1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5:0投票支持一项措施，该措施将阻止美国运营商使用联邦基金从某些公司购买网络设备。这项禁令还没有最终出台，它主要针对华为和中兴这两家电信公司。

5月20日，中兴通信在其网站和官方微博发表中文声明称，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安全局对其做出的制裁决定“极不公平，中兴不能接受”。

5月22日，特朗普提出对中兴公司“以罚代禁”，中兴接受13亿美元的罚款，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等处罚，而美国国会反对解除禁令。

6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与中兴达成新的和解协议，中兴公司支付10亿美元罚款，另有4亿美元保证金交由第三方保管，然后美国才将中兴从禁令名单中撤除。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兴承诺在30天内更换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并开放办公场所，接受美方派员进驻检查。

6月12日，中兴宣布于13日恢复股票交易，从4月17日停牌近2个月，复牌后市值下跌40%。按此计算，一天市值缩水160亿元。

7月13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中兴已将4亿美元保证金存入美国一家银行的托管账户，商务部决定取消对中兴的禁令。同时声明，“商务部会继续保持警惕，密切监控中兴公司的行动，确保他们遵守美国的全部法律和规定”。至此，中兴事件暂告结束。

与此同时，中兴发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公告，今年上半年预亏70-90亿元，上年同期盈利22.93亿元。

3. 贸易战为什么没有避免？

从前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此次贸易战本来可以避免，国内舆论把责任全部归咎于美国，说美国出尔反尔，恐怕有失公允。我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吧！须知，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除了前述不到400字的联合声明和外交辞令的答记者问之外，国内没有公布任何其他有关贸易谈判的信息，连美国提出的一揽子计划也未公开。如果认为它霸道不公、漫天要价，公布后逐条批驳，人们也会看到美国是否要价过高，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第1季度的讨论中，我们明确指出，中美争端决不仅仅是、也主要不是贸易及其差额问题，但从第二次谈判后我们只提及增加进口700亿美元美国商品看，我们简单地把它作为贸易问题来处理。这也许是谈判失败的原因之一吧。

有人说，贸易谈判，讨价还价，争的不是气，而是利。此话一语中的，千真万确。但是争谁的利，却大不一样。在第 1 季度的讨论中，我们同意一般的看法，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那么，其反命题也必然成立。这是把双方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但如果进行具体的结构分析，那却大有学问。一般来说，贸易战对消费者的影响是负面的，避免贸易战自然是正面的。但双方的条件不同，争执的内容不同，对其消费者的影响也不同，我们具体讨论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如能避免贸易战，中国消费者不仅可以享用更多高质量的美国产品，更重要的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也需要开放市场，国家领导人也公开承诺扩大开放，这对中国消费者的好处更大。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开放教育、医疗等服务市场，中国一般老百姓就不需要像现在高官显贵们那样把孩子送到美国，就可以接受到同样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就可能取得真正的突破，因为，有了比较，有了竞争，消费者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改革也就有了压力和动力。再如，如果让谷歌等企业进入，现行的言论控制和互联网管制恐怕也就难以为继，国内老百姓就可以从网上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至于现在打开手机上网，这个屏蔽，那个删贴，人们不得不翻墙去看。当然，这是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及其上级无法接受的。还如，开放市场，国内的行政性垄断就难以推行，国企垄断也会打破，消费者也不会因为电信垄断而支付更高的资费，也不会因为金融垄断，银行赚得满盆满钵，而老百姓存款还要倒贴（负实际利率）。最近公布的世界 500 强就是最好的证明。在 2017 年世界最赚钱的 10 家大企业中，除苹果公司第一外，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位列第 4、6、9、10，其他均为非银行企业；500 强中，美国上榜的银行有 8 家，平均利润 96 亿美元，中国上榜的银行有 11 家，平均利润 179 亿美元，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平均超过 330 亿美元。大概没有人相信中国银行比美国银行经营得好。就此而论，如果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谈判不应破裂，贸易战可以不打，可以进一步协商，在风险可以承受和化解的情况下，订出中国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当然，如果从国有垄断企业的立场来看，则应当拒绝市场开放，加强市场保护。因为，外资的进入和民资的开放，必然分走一部分蛋糕，对它来说是净损失。比如，如果金融开放，四大国有银行就不会有那么多利润，其日子就没有那么好过了。事实上，自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以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有所加快，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会不会使中国振兴的希望落空？我们认为，总体来看，不会。一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创造精神，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而关起门来，只会窝里斗；在垄断之下，只会搞邪门歪道。我们前 30 年的发展得益于开放，日本当年的开放也没有垮掉。二是不打贸易战，才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才能集中力量搞建设，谋发展。三是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真正突破和提升仅靠国家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缺少的不是国家支持，而是市场环境和竞争机制，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真正用到刀刃上的不多，寻租的、贪污的不少，浪费也很大。四是取决于我们在重大问题的正确决策和有效实施，如果决策和应对不当，那么错失机会是有可能的。

我们把中兴公司的案例单独列示出来讨论是有意义的。一是美国对中兴做出禁售七年的决定，是由于中兴违约受罚后不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作虚假陈述，而作虚假陈述的背后原因竟是该公司一些有背景的在美人员没有按照承诺免职，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却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真实写照。对此，我们没有对中兴的行为有任何批评和谴责，反而为其鸣不平，实际上支持和纵容了背信弃义的行为。二是中兴董事会和管理层被迫离职和更换，没有检讨和自责，没有向国人道歉和向利益相关者谢罪，而是以英雄凯旋的方式谢幕。既然如此，他们还会受到重用，其结果可想而知。三是中兴去年因违约被罚 9 亿美元，已从利润中扣除，今年因做虚假陈述再次遭罚 10 亿美元，相当于去年的全部利润。如果是私人公司，一方面老板不会这样做，另一方面发生这样的情况，老板只能上吊，公司只能破产，但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兴却能起死回生？难怪人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发生质疑，美欧日联合限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今年 1-3 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 257 亿美元，早年出现峰值的 2016 年 1-3 月是 854 亿美元。四是国人好面子，但中兴事件连里子都不顾，认栽罚款就不说了，美国撤除禁令的条件还有，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派员进驻监督是否完全执行美国法律和规定，确有点欺人太甚，但我们也接受了。当然，中兴公司官网表示：“痛定思痛，再创辉煌”，人们拭目以待。

贸易战既然争的是利，那就要仔细的算，理性的争，只有争到手的才算是自己的。比如，自从 3 月 22 日贸易争端爆发一来，到 6 月 22 日，深沪股市跌破了 3000 点，市值减少了 70642 亿元，而同期美国股市市值增加了 139400 亿元，一增一减，得失明显。当然，美国股市处于高位，高处不胜寒，有可能缩水，加之体量比中国大，如果缩水，损失也大。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未来究竟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我们既要争现在，也要争未来。如果到手的东西不要，何谈未来。

五、趋势预测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和政策模拟实验室的分析，2018 年第 2 季度，中国外部经济景气程度高位下行，CEEM-PMI55.3，较上季回落 1.2 个百分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全球经济周期进入下半期。美国制造业 PMI 均值 58.7，非制造业 58.2，比上季分别回落 1 和 1.2 个百分点，失业率处于 3.8-4.0%的历史低位，由于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再加上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均处于高位。CPI 和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7%和 2.2%，达到美联储设定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因而年内已经 2 次加息，还有可能再加息 2 次。欧元区经济景气再度回落，工业生产持续走弱，4 月份工业生产指数环比下降 0.9%，能源产出下降 5%，消费者信心从 4 月份的 0.3 降至 6 月份的-0.5，投资者信心指数为 9.3，大大低于预期 18.5 和前值 19.2。欧洲央行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且将今年的增长预测从 2.4%调降为 2.1%。日本经济变化不大，基本稳定。俄罗斯经济受高油价和世界杯的影响，呈复苏态势；巴西因卡车司机罢工和政治局势不确定，经济复苏受阻；印度因“废钞令”影响消退和税改的刺激，经济表现较好；南非经济依然低迷。美元加息使新

兴经济体货币面临贬值压力，部分国家的货币危机和债务风险加大；贸易争端也抑制了其出口和经济增长。

我国国内的情况变化不大，有关政策还会继续，但外部环境随着贸易战的发展而明显不利，出口增长还会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长也会明显回落。据此，我们对第 3 季度和全年的经济走势预测如下

季度 经济指标	2017 年全年 (实际)	2018 年上半年 (实际)	2018 年 3 季度 (预测)	2018 年全年 (预测)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增长 (%)
GDP	6.9	6.8	6.4	6.3
工业增加值	6.6	6.7	6.5	6.4
固定资产投资	7.2	6.0	5.8	5.7
消费品零售额	10.2	9.4	9.0	9.2
出口	10.8	4.9	2.0	3.0
进口	18.7	11.5	12.0	11.8
消费物价	1.6	2.0	2.2	2.3

- 注：** 1. GDP 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余指标按现价计算；
 2. 固定资产投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 工业增加值为国有企业和产品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值。 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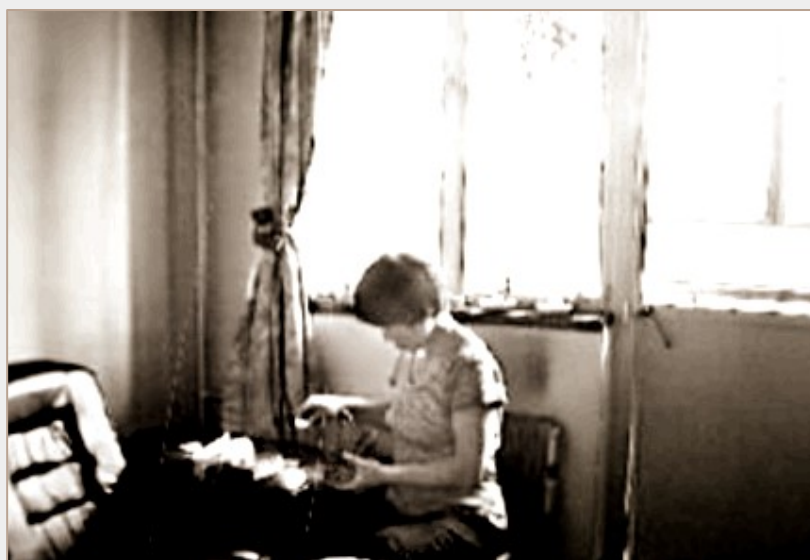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张 弛（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2018 - 07 - 21，于北京

[【返回目录】](#)

陈如珍：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民工对家与归属的追寻

[陈如珍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本文首发于《野外动向》2014年3/4月号]

《汉书》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但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老家的村子，离开父母子女，离开熟悉的谋生方式，离开原有的语言与身份，到城市里打工，适应新的社会价值，同时背起了充满贬义的农民工身份。我一直想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民工为什么离家？”我曾有机会和几位因为思念年幼的孩子而天天拭泪的妈妈民工聊这个话题。“地里都干得冒烟了，如果可以的话，谁会愿意离开孩子呢？”其中一个妈妈的回答道出了孩子的中心地位，还有她为了家庭生计无奈的选择。另一位三十好几的妈妈阿玉说，种田挣不了钱，她需要多存钱，把老家破落的房子翻修，好让儿子长大了可以娶个好媳妇。逐渐地，我明白了民工离家是因为深信，只有通过到大城市挣钱，才能建立一个圆满的家。几年的观察，加上对比两代民工的想法，我却发现面对社会无止境的商品化与对金钱需求的不断扩大，我的民工朋友们似乎困在了筑梦的旅途上，长期漂泊在回家的梦想中。“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描述了离家的旅人，在路途中的磨难与对家的思念。我想透过一段对他们“返家”的身影的描述，来说明民工的梦想与回不了家的困境。



工作中的小玉

虽然大众惯以“民工”一词统称离开农业生产，到城市出卖体力挣钱的农村人，但是所谓民工的年龄、教育程度、老家的偏远程度其实形形色色。他们离家的缘由、选择的目的地，以及在城市里从事的工作，也有诸多的差异。我熟识多年的民工是在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出生的安徽女性。他们第一次离家时，已经是二十好几到三十多岁的母亲。她们在北京从事家务帮佣的工作，先生也全部都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我在二零零零年第一次见到阿玉时，她刚离家两周，穿着她在老家时最好的衣服来应

征帮佣的工作。三十多岁的她脸上有着农人常见的风吹日晒的刻划。她手足无措的把眼光紧钉在地板上。一开口，是在田野间吆喝的音量。等我们熟稔了，我请她带我到她在北京暂住的地方看看。



小玉所住的村子 2011 年

没想到，这竟然是一趟单程长达三个小时的路途。我们从北京四环东北角外出发，一路换了三趟公交车，又走了一段长路，才到达她在北京西南郊区的家。小玉居住的地方是典型的「民工村」。北京郊区原也务农的居民，把家里的四合院，分租给外地来的农民工，转以收租为生。迁入的农民工，又介绍亲戚老乡迁入好互相照料，渐渐地，就成了一个个安徽村、四川村。我们上了拥挤的公交车之后，小玉变得异常的沉默。我逗她说笑，问她问题，她只是牵牵嘴角，点点头。到了东三环东南角的国贸中心等车时，我指指背后有着明亮玻璃帷幕的国贸商城，问她有没有去过，想不想进去逛逛。她回头看了一眼，安静地说：“不想”。我吃了一惊。她解释：“不喜欢进去那些高贵豪华的地方。别人会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上了车之后，小玉又陷入沉默。直到在军事博物馆附近搭乘的第三班公交车向着西南又走了一大段路后，她才有了笑容。路途越来越颠簸，乘客越来越少，慢慢的直来直往的京片子销声匿迹，我赫然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熟悉的乡音包围。周遭几乎全数为女性的乘客叽叽喳喳的，朗声地说着什么，边笑边指着我。小玉也抿着嘴笑，断断续续回答他们的问题，一边大声招呼着车里的熟人。这和我平常见惯了的她，还有先前别扭着不肯开口的样子判若两人。我忽然明白了，这辆北京的公交车开着开着，在什么地方跨越了看不见的边界，进入了安徽老乡的地盘。他们疲累的脸和绷紧的身体在这辆「安徽公交车」上，终于放松了下来。



小玉与她 2004 年在老家重盖的房子，
因为没人住，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其实小玉可以选择乘坐地铁，能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但是她舍不得单程两元左右的票价差。她说挣钱辛苦，每一分钱都要省下来。宁可每天早晨五六点就出门，一天花上至少六个小时在北京的公交车上。我问她存到钱了吗？她开心地说准备过年回家时，就先买砖，存够砖就盖房子。进了她住的院子之后，我又替她觉得一阵心酸。他和先生的小屋，是一间大约两米乘两点五米的小房间。除了一张单人床大小的板床，就只有几件衣服，和门外煮饭的小炉子。一到家她要我先坐坐，然后就自顾自在房门口煮起了汤饭。原来她一大早出门以后，因为舍不得花钱，不论工作几个小时，一定等到回家才再吃东西。她在刷锅的时候，也住在同一个村子的妹妹来了。妹妹比她早离家，个性比较固执也比较有主见。她听懂了我的疑惑，感叹地说：“虽然我们总是盼着回家过年，念着孩子，但是回到老家以后，却觉得心里空空的，着急。得等到又到了北京，才觉得踏实。能挣钱，才踏实。”



小玉的妹妹在她租住的小屋里，和我说是能挣钱才踏实的事

在这趟最初的旅程之后，十多年来我又拜访过他们在北京居住的不同的“村子”。他们暂居的小屋的硬件建设，渐渐地有所改善。但是随着北京的城区不断扩大，追逐着低廉的房价而迁徙的他们，居住的地点也已经从四环撤退到六环外。不管北京的交通建设如何的改进，他们的交通时间却不见减少。他们居住的地方永远是城市的边缘。有时候我会想，也许除了低廉的房价，他们心底深处也宁愿选择一个可以不太卑躬屈膝的「安徽人」的地方。我常常想到「不想去高贵豪华的地方」的说法。曾经有一位老太太在说起她在一九六六年加入全国大串联的故事时提到：“当年，从新疆一路到北京，我一朵花都没看。一有花，我们就把头别过去，因为看花是走资派的行为。”然后可亲的老太太自己笑得好腼腆：“听起来好傻吧？但是，当年我们都是认真的。”我想，如果当时上北京的路上有明亮气派的国贸商城，老太太应该也会别过头去“不想去”。但是，不同的是，小玉及她的民工亲友是被光鲜亮丽的人和地方看不起，所以“不想去”，而不是主动的拒商场于千里之外。这两种“不想去”，说明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说明了民工苦苦离家、挣钱、存钱的追求目标。



安徽老家的农地和农田中的厕所

有好几位人类学家曾经提及，毛的共产党描绘了一个物质丰满的世界，中国人为了对这个美丽新世界的憧憬而牺牲努力。我发现二十一世纪的民工，依然是如此。他们把生活的实在感建立在有收入上；努力存下每一分钱，希望给子女和富起来了的中国匹配的生活方式。但是，从我对长大了的民工子弟的理解，我发现他们都有想在他方寻找认同的愿望。小玉的女儿辍学到河北的工厂工作后，很快就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男友私奔，甚至到青海的高山上开餐馆，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努力。民工离家，挣钱，翻修房子，想着要回去和子女安享晚年的那个家，对他们的子女而言，却在父母离家当年，已经快速的崩解了。 ■

[【返回目录】](#)

郭世佑：观念的脚步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本文首发于中国政法大学报总第 468 期]

近年来，从民间到中南海，关于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的重要性又在旧话重提，中华宪政好事多磨，任重道远。离杭北居前夕，我应绍兴市青年书法家洪忠良之邀，在稽山镜水边小住两日，无意中找到一册编于 1923 年的《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不禁感慨系之。

“会场”即今天的办公楼，编者乃绍兴县议会之议长张锺湘。此君好像生怕后世读者误解，就索性在封面标明：“天汉张锺湘出私货编刻”。老实说，较之时下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都无需自家破费即可竞编个人“文集”的某位人大主任或副主任、政协主席或副主席，我还无法判断那个张锺湘的行为究竟是大方还是吝啬，是豪放抑或拘谨。

在八仙过海沸沸扬扬的民国政坛上，区县议会自然不算什么显赫机关，竟然还能为其的办公楼做出一盘试图传之久远的生日蛋糕来，即便是绍籍史坛巨臂范文澜在世，恐怕也难以断定乡贤此举究竟在当时有何实际意义。尽管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原本就只是相对而言，人人都有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创造“当代史”的权利，人人皆可记载自己的创业过程与结果，但张氏不惜私家解囊编书，到底想表白什么和张扬什么，这是我一见书目就企求弄懂的。

基于资料有限，我无法知道作为立法机关的绍兴县议会之于地方立法与相关监督有何具体建白。然从名士陈骚所撰“书后”可知，报人出身的那位张议长在短短两年任期内，挺身维护数万农、渔之利权，整顿教育，还力举清理县财政，令人称道。原来，《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之所以特附一份《帐据清册》，包括木工、泥工的姓名与工钱，玻璃、油漆等项费用，还有书写门额的 4 元笔资，连同支出总额 7428 元 1 角 4 分 8 厘，就与张氏对身外之物的表率意识有关。相比之下，如今高等学府中的某些斯文人都不愿公开手中的财务收支，遑论识字不多的粗人或细汉，真不知何谓与时俱进。

忠良先生告诉我，那个张锺湘还是越中书画名士。然全书文字均为铅印，未见铁划银钩各显神通，令我纳闷。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整齐划一的铅字无法展示王右军的传人从曲水流觞中孕育出的神采，但那数十副工整、明达和充斥立法诉求与民权理念的贺联，既步武清音鸣凤的蔡伯喈与惊鸿梦马皆是诗的陆放翁之才思，又不乏民权战士蔡元培、秋瑾们的身影。无论是知事、视学等人的作品，还是警察局长和陆军营长的对仗，几乎每一副都以“制宪”、“立法”或“民权”、“人民”为主题，让我眼前一亮。

我忽然明白，作为书家兼议长的张锺湘之所以不愿掏出更多的孔方兄来制作手迹，放弃一显个人身手之机缘，那是因为他深知书法的魅力就在于个性的彰显，而法的威严只需共性的支撑与程序的铺

垫，无论是好事者不分凤舞鸡飞，还是名手们竞仿“永和九年”，似乎都远不及平淡、规范的铅字便捷自然地托起法的朴质与庄重。

无庸讳言，绍兴乃盛产师爷之地，请个吟诗作赋者捉刀，并不比如今找个知书达理的打工仔更难，那些楹联未必都是署名者所亲撰。不过，倘若由此断言那时的警察局长或陆军营长的国学根底一定比今天的同类逊色，断言他们对法与权的鼓呼只是官样文章赶时髦，那就大可不必。辛亥先烈的鲜血毕竟未曾完全白流，“制宪”、“立法”、“民权”、“人民”云云，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且可望超越时空，“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君不见，吾辈今日仍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口号。近见某些领导的报告也在字眼上跟着改“法制”为“法治”，有人就如获至宝，敢涉版权之纠纷，当知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亦曾承认，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民权先驱孙中山的继承者。

古罗马史家塔西佗曾经断言：“世界上只会有好人，而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此言未免过于悲观，人类之于政治制度的创获并非空空如也，滥觞于西欧的宪政制度便是一例。今人常称“中华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而《绍兴县议会会场落成记》不啻提醒我们，至少在民国 12 年冬季的绍兴县，在那块“空招牌”的背后，还有一幢实实在在的议会大楼平地而起和大书特书着，就像在稍后的 1930 年代，至少在南京国民政府附近的梅园，夹点绍兴口音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还能享有一套宽敞明亮的住房，再加一辆进口轿车。

绍兴县议会办公楼之落成距今已整整 80 年了。时过境迁，彼楼已不复存在，该县的地盘还被分割为县境与市区，县、市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都已威震一方。不惟立法之旧瓶均已换上“人大”之新酒，而且“人大”与党委“联合办公”，貌似一条龙服务。至于今人之于法与权的观念能否咸高于张氏一筹，像张氏同好那样既洋溢法、权观念又工于词韵与对仗的后继者又有几何，我却不得而知。

窃以为，法与人一样，原本无所谓尊严。只有二者都被过分漠视和践踏时，尊严的命题才被人发明，而不是发现。如同另一位绍兴人鲁迅实说“希望”时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走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作者附识：2003 年 8 月迁离浙大前夕，奉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秀云女士之邀，为《中国政法大学报》撰稿，以为呈于政法大学的见面之礼，其心之诚，西子可鉴。 ■

[【返回目录】](#)

纳博科夫：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899.4.22—1977.7.2 俄裔美国作家，20 世纪杰出的文体家、批评家、翻译家、诗人、教授以及鳞翅目昆虫学家。本文节选自《文学讲稿》，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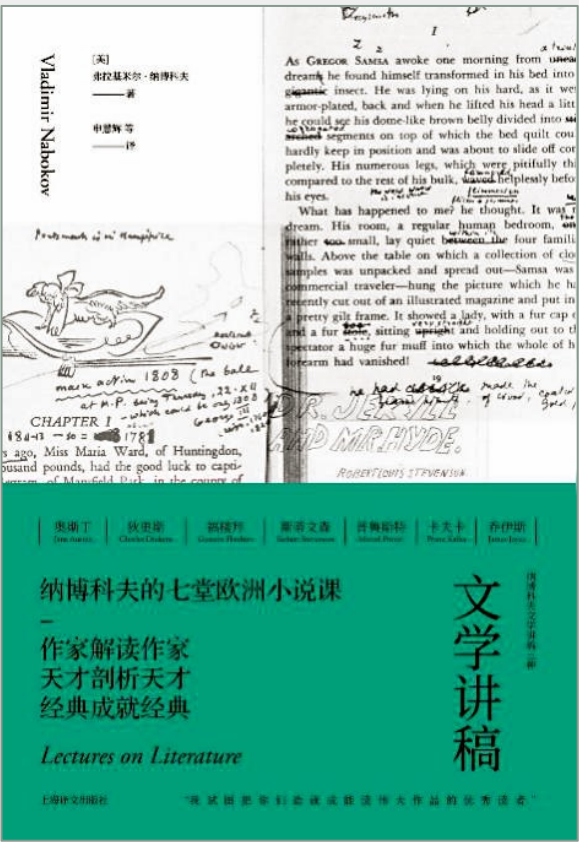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 1899-04-22—1977-07-02]

本书的计划是找几部欧洲名家作品来进行研究。做的时候想本着一种爱慕的心情，细细把玩，反复品味。因此，《怎样做一个好读者》，或《善待作家》这类标题可以作为本书的副题。早在一百年前，福楼拜就在给他情妇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注：原文是法语。）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理解了之后再做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

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的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指望通过一部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当然谁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只要看看由那些新书俱乐部四处兜售的装帧漂亮的标以历史小说的畅销书，就能对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文学名著又当怎样看呢？比如简·奥斯汀，她只了解牧师家庭的生活，而她书中描写的却是英格兰地主阶层的缙绅生活和田园风光，我们可以相信她所描绘的这幅图画吗？再如《荒凉山庄》，这本书写的是荒唐的伦敦城里的荒唐传奇，难道我们可以称其为百年前的伦敦大观吗？当然不行。本书所讨论的其他同类小说也当如是看。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而这里选的小说更是最上乘的神话了。



《文学讲稿》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

在天才作家（就我们能猜测到的而言，而我相信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手里，时间，空间，四季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思想，凡此种种，都已不是古已有之的老概念了，都不能用陈词俗套来应付了，而是非凭艺术家的大手笔铸造出惊世骇俗的文字来加以匠心独具的描绘不可。至于平庸的作家，我们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这些人不去操心创造新天地，而只想从旧家当，从做小说的老程式里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如此而已。不过，他们的天地虽小，倒也能导出一些有点趣味的花样来，招得平庸的读者一时的喜爱；因为他们喜欢看到自家的心思在小说里在一种令人愉快的伪装下得到反

映，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射星球上天，会仿制一个睡觉的人，并急不可待地用手去搔他的肋骨逗他笑。这样的作家手中是没有现成的观念可用的，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融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那里结的浆果是可以吃的；那只从我身边窜过，身上带斑点的动物也许能被驯服，树木环绕的湖可以叫做“蛋白石湖”或者更艺术味一点，叫“洗盘水湖。”那云雾是一座山峰——而且是注定要被征服的山峰。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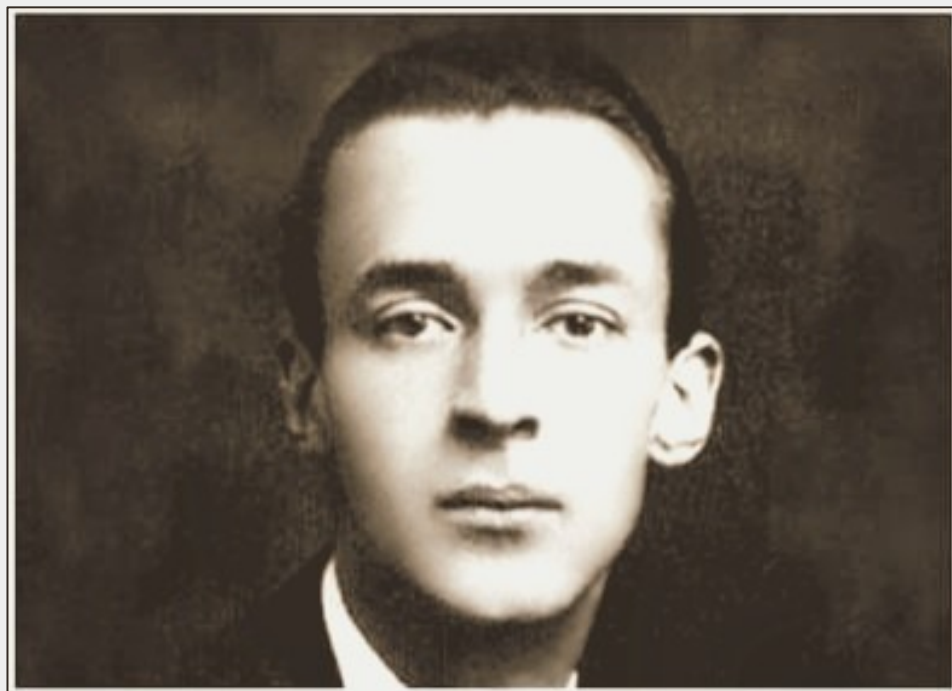
在一次巡回讲学途中，某天晚上我到了一所偏远的地方学院。讲课的时候，我提出了一道小测验题，列举“优秀读者十大条件”，让学生从中选四项足以使人成为优秀读者的条件。原题不在手边，现在记得大体是这样的。请从下面的答案中选出四条作为一个优秀读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1. 须参加一个图书俱乐部。
2. 须与作品中的主人公认同。
3. 须着重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书。
4. 须喜欢有情节有对话的小说，而不喜欢没有情节、对话少的。
5. 须事先看过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
6. 须自己也在开始写东西。
7. 须有想象力。
8. 须有记性。
9. 手头应有一本词典。
10. 须有一定的艺术感。

当时，学生对作品大多看重感情上的认同，情节，社会——经济角度，历史眼光。当然，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一个优秀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这个艺术感很重要，我自己也在不断培养，而一有机会就向别人宣传。

顺便说一句，我这里所指的“读者”是一种泛泛的说法。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听我说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读一本书的时候，两只眼左右移动，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又复杂又费劲，还要跟着小说情节转，出入于不同的时间空间——这一切使我们同艺术欣赏不无隔阂。但是，

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并不需要按照特别方式来移动眼光，即使这幅画象一本书一样有深度，有发展也不必这样。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幅画的时候，时间的因素并不介入。可看书就必须要有时间去熟悉书里的内容，没有一种生理器官（象看画时用眼睛）可以让我们先把全书一览无余，然后来细细品味其间的细节。但是，等我们看书看到两遍、三遍、四遍时情况就跟看画差不多了。不过，总也不要把视觉这一自然进化而来的怪异的杰作跟思想这个更为怪异的东西混为一谈。一本书，——无论什么书，虚构作品也罢，科学作品也罢（这两类书的界限也并不如人们一般想的那么清楚），无一不是先打动读者的心。所以，心灵，脑筋，敏感的脊椎骨，这些才是看书时候真正用得着的东西】。



青年时期的纳博科夫

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样一个问题：闷闷不乐的人看一本轻松愉快的书，他的心里活动会怎么样？首先，他的闷气消了，然后好歹便踏进了这本书的精神世界。但是，要开始看一本书，尤其在年轻人倘若又听到他们私下认为太保守，太正统的人称赞过这本书，往往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过，决心既下，随后的收获也是丰富多彩的。文学巨匠当初运用想象写出了一本书，后来读这本书的人也要善于运用想象去体会他的书才是。

但是，读者的想象各不相同，至少有两种。读书的时候是哪一种合适？一种属于比较低的层次：只从书里寻找个人情感上的寄托（在这类寄情读书法名下还可以分列许多细目），这种读者常常为书里某一个情节所深深打动是因为它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有人特别钟爱某一本书，只因为其中提到某国某地，某处风景，某种生活方式，使他顿兴恋旧之情。还有一些读者就更糟了，只顾把自己比作书里某一个人物；这些不同种类的等而下之的想象，当然决不是我所期望于读者的。

那么，一个人读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才合适呢？要有不掺杂个人感情的想象力和艺术审美趣味。我以为，需要在读者作者双方心灵之间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平衡关系。我们要学得超脱一些，并以此为乐才好，同时又要善于享受——尽情享受，无妨声泪俱下，感情激越地享受伟大作品的真谛所在。当然这种事情要做到非常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有价值的东西无不带有若干主观成份。譬如，分明你们坐在这里，却可能只是我的幻觉；而我也许只是你的一个恶梦。但是，这儿我要说的是：读者应该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处得收抬起他的想象，这需要他弄清楚作者笔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天地。我们必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必须设想小说人物的起居、衣着、举止。《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范妮·普拉斯的眼珠是什么色，她那间阴冷的小屋子是怎么布置的，都不是小事。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被多次搬上银幕，
1997年由**阿德里安·莱恩**执导的影片《洛丽塔》1998年9月在北美上映，
故事讲述了中年男子亨伯特与少女洛丽塔的情爱故事

气质人人不同，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不过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注：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人们在此曾发现史前人类化石。）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扯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无穷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

回头再来看看那个孩子叫狼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

我们期望于讲故事的人的是娱乐性，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上的兴奋，是感情上介入的兴致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游。另一种稍有不同倒也未必一定高明的读者是：把作家看作教育家，进而逐步升格为宣传家、道学家、预言家。我们从教育家那里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识、简单的事实。说来可笑，我就知道有些人看法国小说或俄罗斯小说，目的只在于从中了解巴黎有多快活，俄国有多悲惨。最后，而且顶重要的还是这句话：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奇妙魅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

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而大放异彩。有些名著，虽然也只是内容平实清晰，结构谨严，但给我们在艺术上冲击之大，不亚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或是狄更斯式的富于感官意象的跌宕文字。在我看来，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甩脊椎骨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作品的真谛，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给你带来的兴奋与激动。虽然读书的时候总还要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脱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既是感官的，又是理智的快感，欣然瞧着艺术家怎样用纸板搭城堡，这座城堡又怎样变成一座钢骨加玻璃的漂亮建筑。 ■■■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 年 3 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 年 3 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 年 4 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 年 9 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 年 10 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 2015 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 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3 万元（2018-2019 年度 4-5 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信公众号: 云豹 ONE(ID:chinareview1)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